

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及其意涵： 以道光十五年「廣州省城全圖」為考察中心*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前言

歷史地理學者指出，地方文獻中的地圖「記載了地方歷史地理的演變狀況，而且以其注記包含了大量的社會人文信息，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¹同樣，從古城圖中建築物的地理空間分佈，亦可以探討地方神祠廟宇（以下簡稱祠廟）的發展和變化，及其背後所反映的祠廟與古城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上的關聯性。以清道光十五年（1835）潘尚楫、鄧士憲等編纂《南海縣志》中的「縣治附省全圖」（以下統稱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為例，²該城圖一幅分為兩頁，尺寸為26厘米 x 16.2厘米，是歷來第一幅方志地圖繪製以街巷為主體的、詳細的廣州城地圖，圖中共有街巷地名注記293個。³該圖標示的建築物，除了城中的官衙和府學之外，還有在城內和城郊地

* 本論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劃「廣州道教廟宇處擬博物館」（計劃編號：CUHK 447611）及「清中葉至民國廣州民間廟宇的宗教地理：民間廟宇的歷史、空間及社會功能」（計劃編號：34600214）的部分成果。筆者曾於2015年11月18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近代中國城市的宗教生活」工作坊報告本論文，並且得到康豹教授等所內同仁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¹ 曾新：〈明代廣州城市自然環境及城市佈局的特徵——明代地方文獻中的廣州城地圖研究〉，《嶺南文史》2005年第4期，頁18。

² 潘尚楫等（修）、鄧士憲等（纂）：道光《南海縣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卷三，頁二下至三上。

³ 曾新：《明清廣州城及方志城圖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39。曾新認為「該城圖除城牆走向為示意法繪製外，道路網絡及各類注記基本上是根据實地勘測情況繪製的」（頁140）。不過，要補充的是，曾新稱她所根據的廣州城圖「廣東省城圖（附）」出自阮元道光二年（1822）主修的《廣東通志》卷八十三〈輿地略一〉（頁139）。但是，《續修四庫全書》所收阮元（修）、陳昌齊等（纂）的《廣東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34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清道光二年刊本，1995年），並未見收載該圖；而同治三年（1864）的重刊本《廣東通志》卷八十三〈輿地略一〉則增補了該城圖，見道光《廣東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清同治三年重刊本，1968年），頁1431-32。因此，本文認為曾新所引的「廣東省城圖（附）」的原來出處仍然為道光《南海縣志》繪製的那幅「廣州省城全圖」。

區眾多的祠廟、道觀和佛寺。與明代和清初志書中的廣州城地圖的最大分別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製圖方法已經不再沿用對景法，而是特別明確地繪製出城內和城郊的道路網線和街道名稱。⁴結合圖中的祠廟標注和明確的街道路線的地理資訊，研究者更能掌握和分析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和歷史演變，及其與明清以來廣州城地理變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清初至道光十五年間編修的廣東通志有三部：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刻的金光祖《廣東通志》、雍正九年（1731）刊刻的郝玉麟《廣東通志》、道光二年（1822）刊刻的阮元《廣東通志》；廣州府志有兩部：康熙十二年（1673）刊刻的汪永瑞《新修廣州府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刻的張嗣衍《廣州府志》；南海縣志有兩部：康熙三十年（1691）刊刻和乾隆六年（1741）刊刻的《南海縣志》；番禺縣志有兩部：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刻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的《番禺縣志》。但是，這些官修地方志的廣州城圖顯示出很強的政治屬性，對城區中官衙及附屬機構的標注最為詳盡，以滿足政治和軍事管理者的需求。至於對祠廟建築的標注，則偏重於列入官方祀典的壇廟。以康熙《廣東通志》為例，卷一繪製的「廣州府會城圖」只標記出城隍廟。乾隆《廣州府志》繪製的「廣州府城郭圖」則標示出城隍廟、關帝廟和文昌宮這三座列入官方祭祀的廟宇（見地圖一：乾隆《廣州府志》廣州府城郭圖）。⁵乾隆《廣州府志》卷十七〈祠壇〉的卷首語依據歷來官方所定「正祀」與「淫祀」的區分，強調正祀為「凡有功德於民祀之，城隍、南海之神、武廟、農壇之禮，推至南粵三君、大忠、諸烈、鄉賢、名宦、節孝諸祠，或春或秋，靡不虔祀，所以明敬也」。至於那些在祀典以外且被批評為淫祀的壇廟，乾隆《廣州府志》則稱：「不載于志書。」所持的理由仍然是繼承「淫祀無福」的官方立場：「至非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故勿之載志祠壇。」⁶乾隆《廣州府志》記載官方祀典內的祠壇有：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先農壇和厲壇；祠廟則有：南海神廟、龍王廟、關帝廟、風神廟、天后宮和城隍廟。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壇廟〉所收錄廣州城區的祠廟，主要是列入官方祀典之

⁴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在他創辦並主編的報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的第2卷 (1833年8月，道光十三年) 上發表了一篇 “The Description of Canton City” (〈廣州城概述〉)，文中附錄了道光《南海縣志》繪製的「廣州省城全圖」，但稱該圖為「廣州城及近郊圖」。裨治文評價此圖說：「這裡所附的地圖，是由當地人(不敢說是畫家)繪製的，尚能大致表現出城市的粗略輪廓。這是本地最好的一張地圖的摹本。」見裨治文：〈廣州城概述〉，載龍思泰 (Andrew Ljungstedt) (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261–62。

⁵ 張嗣衍(主修)、沈廷芳(總纂)：乾隆《廣州府志》，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卷二，頁九下至十上。

⁶ 同上注，卷十七，頁一上。「淫祀」一詞出於《禮記·曲禮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見鄭玄(注)、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七〈曲禮下〉，頁204。

內的壇廟，但是列出的數目比之前幾部方志文獻為多，包括太歲廟、南海神廟（即洪聖廟）、火神廟、城隍廟、文昌祠、關帝廟、龍王廟、北帝廟、醫靈廟、天后宮等。另外，有些不列入祀典內的民間祠廟也被道光《南海縣志》收錄，如月泉廟（即華光廟）、華佗廟、大新古廟、斗姥宮、瓊花廟、金花廟等。上述兩類祠廟合計共有二十一座。

除了在卷十二〈壇廟〉列出較多的祠廟之外，道光《南海縣志》保存廣州祠廟記錄的最突出之處是收錄在卷三的「廣州省城全圖」，標注出了更多卷十二〈壇廟〉沒有收錄，但是在那段時期廣州城區仍然存在的祠廟。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以直接找到顯示清晰名稱的祠廟總共有三十六座之多（見地圖二：道光《南海縣志》廣州省城全圖三十六座祠廟分佈）。由於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呈現出清中葉時期廣州舊、新城基本定型的完整城牆輪廓，以及有明顯的街道標注，研究者可以依據該圖來探討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佈局特徵，以及這些祠廟與廣州民居和城區商業中心的地理關係。

然而，由於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始終是官修地方志中的地圖，有理由相信該地圖所標注出的廣州城區廟宇仍不完整，且有遺漏官方祀典以外其他廟宇的可能性。故此，筆者再系統地翻閱從乾、嘉以迄光緒各朝的南海和番禺兩縣方志書，如乾隆六年刊刻的魏綰《南海縣志》、同治十一年（1872）刊刻的鄭夢玉《南海縣志》、乾隆三十九年刊刻的任果《番禺縣志》、同治十年（1871）刊刻的李福泰《番禺縣志》等志書，以及其他類別的清代廣州地方文獻，如嘉慶年間的仇巨川《羊城古鈔》、道光年間的樊封（1789–1876）《南海百詠續編》和崔弼、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等，結果再檢出另外四十二座於道光年間存在於廣州城區的祠廟及其位置所在。即是說，除了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注的三十六座祠廟之外，再加上這四十二座，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有七十八座祠廟（見附表一：道光年間廣州城區七十八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這個數目遠遠超越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壇廟〉收錄的二十一座祠廟。還需要補充的是，這七十八座祠不應是實際存在祠廟的完整數目，還有其他遺漏的祠廟，仍有待增補。但就本文的立論目的而言，在地圖上標注並研究這七十八座祠廟的分佈情況和空間屬性，已可補充過去僅依賴地方志資料，對清代廣州地區的廟宇分佈所作的研究。

本文研究清代中葉時期廣州城內和城郊地區的祠廟及其在城市的空間分佈，因此研究範圍將不包括佛教寺廟。但由於廣州道教宮觀，如五仙觀、應元宮、三元宮、元妙觀、離明觀等，都有奉祀關帝、北帝、文昌帝君、華光大帝和金花夫人等神祇，或其建築群中有相關配祠的殿宇，因此，這五座道觀亦計入本文收集和考察的七十八座祠廟之內。這群廟宇奉祀的傳統中國神祇包括關帝、天后、文昌帝君、華光大帝、北帝（又稱真武、玄天上帝）、純陽孚佑帝君（又稱呂祖）、金花夫人、斗姥元君、洪聖南海神、城隍神、東嶽大帝、海龍王神、土地神、風神、火神、扁鵲、華佗、三界神、馬神、曹主娘娘、急腳先鋒楊四爺、牛王，共有三十多位。

本文研究廣州城區祠廟空間分佈的方法，主要是以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為底圖，進行直接、間接和推算的定點工作，⁷首先儘量找到七十八座廣州城區祠廟所在的街道位置，且在地圖上確定它們的位置標定之後，進而在新增定位點的地圖中（以下稱為〔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見地圖三：〔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七十八座祠廟分佈），從總體的分佈情況和空間位置關係的角度，探討在道光年間七十八座祠廟在廣州城區的空間佈局及其與廣州舊城、新城及城郊地區的城市發展之間的關係。雖然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已經明確地繪製出城內和城郊的街道路線，但是，由於該地圖不屬大比例尺的地圖，因此祠廟所在的街道位置並非完全精確定位，甚至個別祠廟相對位置的標定有偏差錯誤。⁸然而，〔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已經不僅是一幅限於視覺效果的粗略示意圖，更是能夠提供空間分析線索，去理解清代廣州祠廟分佈的趨勢及其與周遭街道區域開發之間的關係。⁹為了說明這七十八座祠廟與現在廣州地區的關係，筆者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以1948年出版的《廣州市街道詳圖》為底圖，在 ArcGis 軟件的協助下，對《廣州市街道詳圖》進行空間配準和地圖資訊數字化的繪製工作，之後輸入道光年間廣州城區七十八座祠廟的地址，進行空間推算的定點工作。在數字化廣州街道圖資料的基礎之上，我們從總體的分佈情況和空間位置關係的角度，探討這七十八座祠廟所在位置之間的關係（見地圖四：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七十八座祠廟分佈（以1948年《廣州市街道詳圖》為底圖））。¹⁰

⁷ 本文利用道光《南海縣志》中的「廣州省城全圖」為底圖，根據不同的定點方法，把列表中的七十八座祠廟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直接定點祠廟，即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直接找到顯示名稱的，如關帝廟、龍王廟、三元宮、東嶽廟及城隍廟等。第二類是間接定點廟，即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找到廟宇所在的街道、地域或地標名稱，如在西寧臺的三界廟及燈籠街的華光廟等，西寧臺及燈籠街在道光廣州府城圖上有清晰顯示。第三類是推算定點廟宇，即運用清代縣圖上的地理位置配合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推行推算，例如運用同治《番禺縣志》中縣城圖上所顯示的東教場及雄鎮坊，推算天后宮及雄鎮古廟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的位置。

⁸ 關於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廣州內城的比例，曾新《明清廣州城及方志城圖研究》說：「據筆者測算，該城圖中廣州內城的比例：東西方向據惠愛直街一線測算約為1：14900，南北方向據大北門直街—四牌樓—歸德門一線測算約1：15200；新城的比例：東西向約1：16400、南北向約1：14000。」（頁140）

⁹ 運用精確的位置地圖資料來進行歷史地理研究的例子，參范毅軍、白璧玲、嚴漢偉：〈空間資訊技術應用於漢學研究的價值與作用〉，《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01年5月），頁75–82；范毅軍：〈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第102卷第4期（2001年4月），頁160–91。

¹⁰ 筆者曾經利用經過數字化的《廣州市街道詳圖》（1948年出版）為底圖，輸入民國初年廣州市六十四座廟宇的地址、廣州市二十九個分區的區界、各分區的人口數和二百七十四間正一派喃巫道館等資料，然後從總體廟宇的分佈情況和空間位置關係的角度，分析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之前正一派喃巫道館在廣州市區的空間佈局，以及探討有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廣州市的分區人口發展及相關的六十四座廟宇的所在位置之間的關係。見黎志添：〈民國時期廣州市正一派火居道士營業道館分布的空間分析——廟宇、人口與道教儀式〉，《漢學研究》第32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293–330。

除了地理資訊所提供的祠廟空間分佈信息之外，本文又以傳統地方文獻、原始的廟宇碑刻資料和長期田野考察成果，結合地圖的空間屬性資料，試圖研判出一般地方祠廟文獻研究所未能表達出的具有真正空間意義的廟宇歷史信息。本文使用的廣州廟宇碑刻資料來自於筆者經過長期搜集和進行廟宇實地考察而於2013年出版的《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¹¹ 筆者一共搜集了從宋、明而迄清末(1910)，在廣州府縣境內的二百八十二通與一百二十一座祠廟的歷史活動有關係的碑刻文獻。收錄在該書中，並與本文探討的七十八座祠廟有直接關係的廟宇共有十五座，以及相關的碑刻文獻五十九通。廣州廟宇碑刻文獻資料不只對於研究地方廟宇極為有用，也能提供非官方的地方社會經濟、歷史、廟宇組織和宗教信仰等豐富信息。

清代廣州城的地理形勢及城區街道發展概要

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清楚顯示出廣州城經歷明代洪武(1368–1398)而迄清順治四年(南明永曆元年, 1647)二百多年之間，歷次修築之後基本定型的完整輪廓。概括而言，即是把宋時三城(子、東、西)連合為一，把城北擴展至粵秀山，在內城(即稱舊城)之南的沿江地帶增築新南城，以及由於珠江沿岸新淤灘面積不斷擴大，因而在新城外再築城牆，由東西兩側向南延伸，直達珠江岸邊(由於形似兩雞翼，故名「雞翼城」)。¹²

因此，清代廣州城是由城牆圍繞而建成的，有近乎正方形制的城廓，且又由橫貫東西的一道城牆分成兩個部份，即北邊較大的舊城和南邊的新城。明萬曆三十年(1602)刊刻郭棐纂修的《廣東通志》卷十五稱：「〔舊〕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計一十五萬一百九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廣二丈，下廣三丈五尺，為門七：曰正北、稍東曰小北，曰正東、曰正西、曰正南、稍東曰定海、西曰歸德。」¹³ 乾隆《廣州府志》卷四記載，舊城為門八，即除舊有七座城門之外，在正南門和定海門之間新築一座城門，稱文明門。¹⁴ 至於新城的規模，據寫成於嘉靖年間的〈廣東新築子城記〉稱：「自東徂西，延袤共計一千二百有二丈。署門三，南、東以西各門上，樓櫓咸具。又署小門五，署水門二，東西各一。」¹⁵ 據此，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清代舊城和新城城門合共有十六座，從北面開始，然後依次向西、向南、向東，廣州城城門的名稱為：正北門、正西門、太平門、竹欄門、油欄門、靖海門、五仙門

¹¹ 黎志添、李靜(編著)：《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¹² 關於明初廣州城的擴修經過，參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45–60、378–80；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1–29。

¹³ 陳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萬曆《廣東通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影印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刻本(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卷十五，頁368。

¹⁴ 乾隆《廣州府志》，卷四，頁一。

¹⁵ 〈廣東新築子城記〉，轉引自曾昭璇、曾憲珊：〈宋、明時期廣州市歷史地理問題〉，《嶺南文史》1985年第1期，頁110。另見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15。

(明代名五羊門)¹⁶、永清門(明代名南門)、永興門(俗稱便門¹⁷)、永安門、正東門、小北門。至於從內城進出新城的四座城門，自西至東有歸德門、大南門、文明門和定海門。

明清兩代廣州城為南海縣和番禺縣分治。道光《廣東通志》稱：「南海分治西境，……番禺分治東境。」¹⁸據同治十年《番禺縣志》卷二的「捕屬圖」，可知兩縣在城內的分界是從城北粵秀山鎮海樓往南，沿正南街、承宣街(今北京路)，直出正南門，並沿新城往東邊濠畔街，向南經大新街、小市街，直出五仙門。¹⁹至於十六座城門所屬縣的分治，據乾隆《廣州府志》卷四，「舊城之正北、正西、歸德，新城之太平、竹欄、油欄、靖海、五仙八門，南海分治。舊城之正東、正南、小北、文明、定海，新城之小南、永清、永安八門，番禺分治」。²⁰

據道光《南海縣志》的記載，舊城內屬於南海縣管轄的街道有四十七條，新城區有街道三十一條；²¹據同治《番禺縣志》的記載，在舊城屬番禺縣區的街道有四十八條，新城區有二十四條。²²由此可知，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共有街道九十五條，而新城區則有五十五條街道，合共有街道一百五十條。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展示出廣州舊城分別以承宣街(今北京路)和惠愛直街(相當於今天的中山三路至中山七路)為南北向和東西向中軸線的佈局特徵。「地圖中的主要幹道有南北向及東西向大街各一條，且呈丁字型交匯」。²³從城門的位置及建築物的分佈狀況分析，正西門沿東西向惠愛直街可直通正東門，大北門南下直街(相當於今解放北路至解放中路)可直通歸德門，因此可以說城內的城門是相對的、直通的。舊城內南北向的主街，除了大北門直街和承宣街，還有德政街(今德政路)是從番禺縣衙直出定海門的主要直街。

至於新城區則是沿珠江建立的，街道佈局與舊城內街道呈丁字型交匯有明顯不同。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注新城直通珠江江邊(碼頭)的南北向道，而這些南北向的街道又自東向西排列，且同時發展為東西走向長街，沿珠江江岸伸展，如明代以

¹⁶ 五仙門，明代稱五羊門，在五羊驛街，驛臨珠江。見萬曆《廣東通志》，卷一，「廣東省城圖」，頁33。此外陳子升《中州草堂遺集》有〈五羊門詩〉云：「船維五羊驛，車發五羊門。」(轉引自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358)

¹⁷ 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羊城古鈔》(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卷一，「外城」條，頁67。

¹⁸ 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二五，頁2。

¹⁹ 見李福泰(主修)、史澄等(纂)：同治《番禺縣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卷二，頁二下。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說：「小市街：今解放南路，為南海、番禺兩縣分界街。」(頁121)

²⁰ 乾隆《廣州府志》，卷四，頁一。

²¹ 道光《南海縣志》，卷六，頁二下至三上。

²² 同治《番禺縣志》，卷三〈輿地畧一〉，頁二下至四上。

²³ 曾新：〈明代廣州城市自然環境及城市佈局的特徵〉，頁23。

來一直繁榮的濠畔街和高第街，以及隨著河岸灘地的發展又陸續形成東西走向的橫街，包括東橫街、西橫街、小新街、大新街、賣麻街等。²⁴

道光年間廣州人口有多少是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原因是廣州城的東、西地區被劃分為兩個部份，分別歸入南海縣和番禺縣的管治，而歷來兩縣志書只有全縣戶口數，沒有城內人口數字。雖然如此，「在〔清代〕這三百多年間，不拘哪個時期，絕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認為廣州的人口至少有一百萬。這一數目的估算通常包括城內和城郊的居民以及珠江上的船民」。²⁵例如，裨治文發表於道光十三年（1833）的〈廣州城概述〉一文估計，廣州的人口數字可能為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人。²⁶並且，廣州「城郊的面積和人口都不見得比城牆內的市區少」。²⁷依他的估計，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人中除去生活在珠江面上的二十五萬二千水上人，剩下一百萬城內和城郊人，約各佔一半，即約在五十萬左右。

然而，廣州城作為嶺南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舊城區空間佈局的形式在明清兩代基本保持不變，體現出古代都市佈局的「擇中論」思想。²⁸城區中部偏北區域為重要官衙所在地，即是以惠愛街以北之地作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區，省、府、縣各級官衙、府庫、官吏居里集中佈署於此一帶地區。清初，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和靖南王耿繼茂（？–1671）率兩藩兵將共二萬餘人南下，於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攻破被圍困達十個月之久的廣州城；入城之後，即令「官兵悉居城內，官衙民舍遷移城外」。²⁹但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亂平定、次年康熙下令撤除藩府之後，廣東巡撫李士楨（1619–1695）「命文武各官入內城設立官署」。³⁰康熙三十四年（1695），吳震方遊歷廣州後記載，清初廣州舊城為「尚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圈住，大小衙門俱在內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³¹如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所展示，以布政司前承宣街為中軸，且從惠愛街自東而西的官署分佈，有番禺縣署、布政司署、廣州府衙、巡撫部院、將軍署、漢軍副都統署等。不過，廣州城內的政治活動區域也有向南延伸至惠愛街以南、承宣街以西的內城中部區域，如置有按察司廳、鹽運司署、督糧道署、南海縣署等。舊城的軍事活動中心區，有駐防的

²⁴ 參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15；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359。

²⁵ 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廣州景觀（1517–1840）——以旅行者、傳教士和使團成員的記述為中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頁32。

²⁶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320。

²⁷ 同上注，頁260。

²⁸ 曾新：〈明代廣州城市自然環境及城市佈局的特徵〉，頁22。

²⁹ 李士楨：〈重建鎮海樓記〉；轉引自黃佛頤（編纂），仇江、鄭力民、遲以武（點注）：《廣州城坊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一，頁8。

³⁰ 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七，頁290。

³¹ 吳震方：《嶺南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上卷，頁3。

八旗漢軍和八旗滿軍。³²根據《駐粵八旗志》，康熙二十年，「廷議於廣州設立駐防八旗漢軍兵三千名」；及後乾隆二十年（1755），「京師揀選滿州八旗兵一千五百名挈眷來廣州，合裁存之漢軍兵為三千名，滿漢合駐」。³³滿州八旗和漢軍八旗兵各自以正白旗、正黃旗、正紅旗、正藍旗、鑲白旗、鑲黃旗、鑲紅旗、鑲藍旗這八種不同顏色的旗幟來劃分。在廣州舊城劃出為滿、漢八旗兵駐防和居住的區域，稱為「旗境」或「旗民區」。《駐粵八旗志》記載八旗的地界：「省垣自大北門至歸德門止，直街以西概為旗境。自九眼井街以東至長泰里，復西至直街以東，則屬民居。旗境舊分八段，乾隆丙子滿漢合駐，遂分為十六段。」³⁴《駐粵八旗志》中的「旗境分界圖」有漢軍和滿州軍八旗境的明顯標注，³⁵以大北門南下直通歸德門的直街等以西地區劃為八旗地區，但各旗駐防地段各異。漢軍八旗的公推、箭道和牧馬圈主要集中在舊城的西北邊地區，³⁶即起自西門，經惠愛街首、二約而北向接連大北門直街以西的區域，廣州語一般稱這段漢軍旗境區為「旗下街」。³⁷這裡的寺觀和廟宇有光孝寺、六榕寺、元妙觀和文昌廟。滿八旗軍境則分佈在惠愛街以南跟直街以西的地區，與漢軍八旗境一樣，滿州八旗在所屬境地劃出公推、箭道和牧馬圈。這一區有廣州歷史最悠久的道觀五仙觀。³⁸

雖然如孫蕢（1333–1389）〈廣州歌〉中唱道：「城南南畔更繁華。」³⁹但是舊城內仍然有繁華的商業區。在承宣街（及雙門底）⁴⁰與惠愛路交接的丁字路口路段形成的舊城商業區，各種店鋪紛紛建立，以滿足城內滿、漢官員及其眷屬的日常生活需要。張心泰《粵遊小識》記載了每年歲晚在雙門底的花市盛況：「每屆年暮，廣州城內雙門

³² 楊紹權介紹漢軍八旗的歷史由來說：「漢軍旗是努爾哈赤佔明代統治關東諸縣的時候開始編制的。」見楊紹權：〈清代廣州駐防漢軍旗的歷史〉，《廣州文史資料》第7輯（1963年4月），頁128。

³³ 長善等（修）、劉彥明（纂）：《駐粵八旗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廣州龍藏街詔元閣刻十年（1884）增修本，卷一，頁664。

³⁴ 同上注，卷二，頁682。

³⁵ 同上注，頁681。

³⁶ 同治《番禺縣志》卷五三〈雜記一〉記載：「兩藩戰馬數逾萬匹，省垣既定，散豢於城中。」（頁二一下）

³⁷ 楊紹權：〈清代廣州駐防漢軍旗的歷史〉，頁127。

³⁸ 關於清初駐粵滿漢八旗兵的歷史、駐防地段的劃界及組織制度，參于城：〈廣州滿漢旗人和八旗軍隊〉，《廣東文史資料》第14輯（1964年），頁172–97；汪宗猷（主編）：《廣東滿族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頁4–6。

³⁹ 轉引自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七，「濠畔朱樓」條，頁492。

⁴⁰ 屈大均解釋「雙門底」的來歷說：「廣州有崇樓四，在南者曰拱北，故唐之清海樓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劉襲鑿平之，疊石建雙闕其上，宋經略某改雙闕為雙門，民居其下，今號曰雙門底云。」見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十七〈宮語〉，頁468。

底賣吊鐘花與水仙花成市，如雲如霞，大家小戶，售供座几，以娛歲華。」⁴¹陳徽言道光三十年（1850）撰序的《南越遊記》，亦記載了道光年間廣州居民在九月十八日於雙門底為慶祝華光大帝神誕而隆重舉行「保境平安醮」，其盛況足可證明此處地段是舊城的繁華地區。《南越遊記》云：「雄鎮街市〔即承宣街以南〕通衢建篋棚，棚高數丈，軒豁宏敞，塗以五色，皆花鳥人魚之狀。下復承以布幔，張燈施彩，中多琉璃洋物。市門各懸傀儡，造製奇巧，錦繡眩目。兩旁闌干內羅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錯雜繁廕，靡不工緻。閒數武則有彩軒，中奏八音，歌聲達旦，往來者流連觀聽。自藩署直至南門，燈火輝煌，金鼓喧震，男女耳目，勢不暇給，凡三晝夜。復演劇以終其事，合計所費不下萬金。」⁴²

廣州舊城是政治和軍事活動集中的地區，新城地區則發展成為繁忙的商業經濟活動中心地，商鋪眾多。其實，自南宋以後，因為外貿日益發展，廣州城南沿江北岸已經興起成為新的商業中心。⁴³南宋嘉定三年（1210），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陳峴為保護南城區的一大片繁華商業區，在廣州三城的城南外築東西雁翅城（南城）直至海邊，東翅長九十丈，西翅長五十丈。⁴⁴據曾昭璇、曾憲珊說，「〔明〕新城興建的基礎為宋雁翅城」。⁴⁵南城區的宋街範圍基本上都劃入明清時期的廣州新城區，例如，「按記載〔南城區〕有高第街、濠畔街、清水濠街、賣麻街、東橫街、西橫街、狀元坊等」。⁴⁶廣州新城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開始興建的，翌年竣工。⁴⁷萬曆《廣東通志》卷十五記載：「〔嘉靖〕四十二年甲子〔1563〕，⁴⁸都御史吳桂芳以柘林兵叛，蹂踐城外居民，剏築自西南角樓，以及五羊驛，環遶至東南角樓新城，以固防禦。」⁴⁹新城範圍雖不大，但在建城之後已經成為廣州城的商業中心區，且是省內外商人與外國商人互通貿易的地區。

明初以後，廣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往來商舶絡繹不絕，「番舶銜尾而至」；許多商品如絲綢、瓷器缸瓦、鐵器、糖等從各省源源不斷地匯集廣州，售予外國商

⁴¹ 張心泰：《粵遊小記》；轉引自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二，頁219。

⁴² 陳徽言：《南越遊記》，《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1914年雲南叢書本，卷二，頁291。

⁴³ 曾昭璇、曾憲珊：〈宋、明時期廣州市歷史地理問題〉，頁102。

⁴⁴ 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五「陳峴」條云：「城以南，戶口繁夥，舊無扞蔽，乃築東西雁翅城以翼之。」（頁339）另參陳大震、呂桂孫（纂修）：大德《南海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元大德刻本，卷八，頁22。

⁴⁵ 曾昭璇、曾憲珊：〈宋、明時期廣州市歷史地理問題〉，頁109。

⁴⁶ 同上注，頁102-3。

⁴⁷ 〈廣東新築子城記〉稱：「嘉靖乙丑（1565）二月初吉，越丙寅正月而訖。」（轉引自曾昭璇、曾憲珊：〈宋、明時期廣州市歷史地理問題〉，頁109）

⁴⁸ 曾昭璇、曾憲珊〈宋、明時期廣州市歷史地理問題〉說：「《郭通志》稱嘉靖四十二年建，不確。可能是提出建城之議。因吳桂芳是該年上任的。」（頁109）

⁴⁹ 萬曆《廣東通志》，卷十五，頁369。

人，從中大獲其利。⁵⁰當時新城區內的濠畔街（今解放南路）是商業最為繁盛之處，「天下商賈聚焉」，⁵¹街內有浙紹、江蘇、湖南、金陵、山陝、安徽、新安等外省豪商聚集的會館、銀莊（俗稱西號）和貨莊。⁵²屈大均《廣東新語》描述當時繁華的濠畔街稱：「是地名濠畔街，當盛平時，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⁵³此外，新城內城門區，如油欄門和竹欄門都是沿河成行成市的商業區。「欄」是貨物的聚散地，具有批發性質。⁵⁴油欄和竹欄即是代表全城的油料和竹料的集散地，購買者來欄口（即物資商店）買物，再販運至全城。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注出由竹欄門直達江邊碼頭的竹欄直街，南北貫通新城，以賣竹為主。裨治文〈廣州城概述〉亦有記載竹欄門和油欄門「是為大量的入城商品運輸而設計的」。⁵⁵

從明嘉靖四十四年建新城至清順治四年間，由於珠江沿岸泥沙淤積，沙坦日增，珠江江岸又淤出了二十多丈灘地。⁵⁶雖然靖海門和五羊門外城南東西沿江的大街小巷還未出現在萬曆《南海縣志》中的「廣州府城郭圖」，不過到了清初，新城城南外沿江新積灘地已發展成為商業區；由於商鋪林立，需加保護，因此，「國朝順治四年冬，總督佟養甲築東西二翼城，各長二十餘丈，直至海旁，為門各一，即今所謂雞翼城也」。⁵⁷雞翼城建有兩座城門，其東南曰便門，其西南曰安瀾。東南便門通接東西向大街，如湛塘街、萬福里、石基里等；西南安瀾門通接安瀾街、會仙街和迎祥街。南北小巷主要有油欄直街、靖海直街、五仙直街、倉前街、珠光里等；南北向小巷緊密排列，大多直通江邊和沿江重要碼頭，為貨物裝卸和運送及居民擔挑領用

⁵⁰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四〈食語〉云：「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頁371-72）關於明代廣州對外貿易的研究，參李龍潛：《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79-312；章文欽：〈明清時代荷蘭與廣州口岸的貿易和交往〉，載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84-337。

⁵¹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七〈宮語〉，頁475。

⁵² 劉正剛：《廣東會館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22；沈瓊樓：〈廣州市濠畔街和打銅街的變遷〉，《廣州文史資料》第7輯（1963年4月），頁2-3；童漱石：〈廣州濠畔街山陝會館的葯材行〉，載廣州市政協（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8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461-63。

⁵³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七〈宮語〉，頁475。

⁵⁴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四〈食語〉云：「廣州凡食物所聚，皆命曰欄。販者從欄中買取，乃以鬻諸城內外。欄之稱惟兩粵有之。」（頁395）

⁵⁵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259。

⁵⁶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379；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19。

⁵⁷ 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一，「東西二翼城」條，頁67。

水的通道。⁵⁸裨治文〈廣州城概述〉描述廣州雞翼城這一片東西向沿江岸佈局的街道地區說：「在城南，街道和房舍佔據了從城牆到江邊的全部空間。」⁵⁹

就本文研究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佈局特徵的目的而言，我們不能只注意廣州舊城和新城區的道路和經濟的發展，而應把敘述範圍擴大到廣州城外的郊區。因為自明清以降，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廣州城區逐漸擴張至城外。只需觀察道光年間廣州祠廟的數量和分佈，就可證明這一點。七十八座廣州城區祠廟中，有二十五座就坐落在城西門外的西關地區。西關是指廣州城西郊外的一大片土地，「其範圍大致北至西村增步，南瀕珠江，西到流溪河岔道。這裡原是江河交匯，地勢低窪，星羅棋布的湖泊和縱橫交錯的河流的水鄉澤國。以後由於河流泥沙的淤積，逐漸成陸」。⁶⁰從城西門外北高南低的東北部（西門外）和西南部（太平門外）的區域來劃分，西關又可劃分為「上西關」和「下西關」兩個大區。雖然西關在明代仍然是一大片農田和村落，但是在村落堤圍（俗稱為「基」）之上已建立起店鋪，形成了新的街區，即是被稱為十八甫（十八條街）的商業街圩。⁶¹清代中期西關的農田面積顯著減少，當時紡織業、五金手工業迅速發展，並主要分佈在西關。因此，村落、農田被改成機房區；廠房、街道、店鋪、住宅區不斷增加。據裨治文說，廣州附近的布匹紡織工場在當時已有二千五百多家店鋪，他們的織機很簡單，通常平均每每家店鋪有工人二十名。按此，從事布匹織造的人數約有五萬人。⁶²西關就此成為廣州主要的紡織業加工區。隨著西關的經濟日益發展，人口不斷增多，在十八甫機房區之西，逐漸形成廣州城西外新的商業和住宅區。⁶³根據道光《南海縣志》記載，當時在西關地區西門外東北地區的上西關有三十六條街，而由新城西南太平門外進入下西關的地區則有一百三十四條街。⁶⁴可見，至道光年間，隨著城市和手工商業的發展，在上、下西關之間的平原地區又形成了一個廣州新城區。裨治文〈廣州城概述〉一文描述西關說：「城郊的街道、房舍，如果跟城牆內有所不同的話，其差別也很少。在城西，街道和房舍差不多以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的形狀向外伸展。」⁶⁵

⁵⁸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19。

⁵⁹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260。

⁶⁰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22。

⁶¹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解釋「甫」的意思說：「按甫即鋪，為明末商人自衛組織。其時黃蕭養起義，西關街圩即自行組織，以防盜賊，在街頭尾立柵，建門樓防守，各甫自建碼頭，稱為『水腳』。」（頁383）

⁶²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318。

⁶³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23；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387-90。關於清中葉後西關住宅區的發展過程，參廣州市荔灣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荔灣區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80-81。

⁶⁴ 道光《南海縣志》，卷六，頁二下至四下。

⁶⁵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260。

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的祠廟分佈及增補

舊城

根據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的標示，在廣州城內和城郊有三十六座祠廟（參地圖三）：舊城內十三座；新城街內一座和新城門外南區三座；城西門外上、下西關九座；城北大北門外西一座和小北門外東四座；東門外五座。

舊城內的十三座祠廟，計有龍王廟、關帝廟（二座）、文昌宮〔廟〕（二座）、三元宮、應元宮、五仙觀、元妙觀、華佗廟、東嶽廟、城隍廟、藥王廟。除了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標示的十三座祠廟之外，筆者還從其他志書、文獻和碑刻中再檢出另外十五座道光年間在舊城內存在的祠廟，即在舊城內至少合共有二十八座神祠廟宇（見地圖五：道光年間廣州舊城二十八座祠廟分佈位置圖）。

首先，可以舉在舊城豪賢街的二聖宮（又稱二聖古廟）為例。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沒有標注二聖宮，但是同治十年《番禺縣志》中的「縣治界圖」則標示出二聖宮的所在位置；而1931年刻的宣統《番禺縣續志》則收有一通二聖宮於道光十六年（1836）重修廟宇後刻立的碑記〈重建豪賢街二聖古廟碑〉。⁶⁶碑載：「皇帝御極之十年，⁶⁷重修二聖古廟落成，以祀關帝、華帝者也。後殿則並祀斗姥、觀音。」⁶⁸

另一座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沒有標示的祠廟是北帝廟（俗稱北廟），廟在北門直街。道光年間樊封《南海百詠續編》云：「北廟，在大北門直街。規模雄駿，香火至盛。兩廊碑碣林立，皆宋元刊刻。……明時合築三城，鑿象岡以為北門，是廟移而東向，改祀真武。」⁶⁹同治十一年刊刻的鄭夢玉《南海縣志》卷十一〈金石略〉收錄有四通「嵌大北門直街北廟東廊」的碑文：（一）萬曆四十八年（1620）〈文昌帝君暨侍者像石刻並題字〉；（二）天啟元年（1621）〈老子像石刻暨題字〉；（三）崇禎六年（1633）〈許真君像石刻暨題字〉；（四）順治十六年（1659）耿繼茂撰〈重修玄帝廟碑記〉。⁷⁰據上述碑刻和文獻資料的記載，坐落在大北門直街的北廟應屬廣州城最古老的祠廟之一，至少在宋代時已創建（「兩廊碑碣林立，皆宋元刊刻」）。耿繼茂〈重修玄帝廟碑記〉記

⁶⁶ 梁鼎芬（修）、丁仁長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州府縣志輯》影印民國二十年（1931）重印本（上海：上海書店，2003年），卷三八〈金石六〉，頁522-23。關於此碑的錄文、點校和內容介紹，參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錄文集釋〉，頁3。

⁶⁷ 二聖古廟是於道光九年（1829）里人沈懷仁等募捐，撤而新之。十年（1830）落成，十六年（1836）立碑紀其事。

⁶⁸ 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4。

⁶⁹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叢書集成續編》影印1916年翠琅玕館叢書本，卷三〈神廟〉，頁246。同文收入鄭夢玉等（修）、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廣州翰元樓刻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五，頁119。

⁷⁰ 同治《南海縣志》，卷十二，頁200-201。

載了北廟的廟規模字：「廟橫廣可五丈許，深倍之；前為廟門，後為正殿，祀玄帝，以文昌帝君配，志右文也。迤東更闢一院，祀帝小像，兼為僧舍，以供香火。」⁷¹

第三個不能不提的例子是金花廟，廟在舊城仙湖街清源巷口。雖然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沒有標示出仙湖街的金花廟，但在同書卷十二〈壇廟〉中記載：「金花古廟，在內城仙湖街清源巷口，有金花仙蹟。明成化五年巡撫陳濂修，舊名靈應祠。」⁷²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云：「惠福祠，在僊湖街僊童橋側，都人祭賽金花夫人廟也。」⁷³據說，廣州婦女求子者多往金花廟拜金花普主惠福夫人。⁷⁴金花廟不只奉祀主神金花普主惠福夫人，左右兩旁還各塑二十位奶娘（神姨）像。婦女祈求男孩者，入廟參拜，「以紅絨繫姨臂，祝曰：『嬰當屬我。』」⁷⁵舊城仙湖街金花廟於明成化五年（1469）創建之後，雖有嘉靖初年因為廣東提學魏校（1483–1543）推行搗毀淫祠令而被毀，神像也遭焚，⁷⁶但「其後粵人復建廟於故處」。⁷⁷樊封曾回應魏校毀金花廟一事，批評這是明代理學家不近人事的所為：「金花夫人亦高禱類耳，安得云為淫祀。明季理學家荒經武斷，不近人情，大都類此。」⁷⁸光緒元年（1875），英國傳教士 John Henry Gray（1828–1890）出版的《廣州城之行》（*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提及當時仙湖街金花古廟仍尚存。⁷⁹

除上述二聖宮、北廟和金花廟外，其餘十五座未標注的舊城祠廟中，又以關帝廟佔最多數，共有五座。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標示了坐落在粵秀山麓和惠愛街城隍廟之右的兩座關帝廟，乾隆三十九年刊刻本的任果《番禺縣志》和道光二十九年

⁷¹ 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 508。

⁷²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二三上。

⁷³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 247。

⁷⁴ 關於明代金花夫人傳說的緣起，黃佐云：「舊志，靈應祠在廣州仙湖之西。故老相傳：神，廣之金氏女也。少為巫，姿容極美，時稱為金花小娘。後沒于仙湖之水，數日屍不壞，且有異香。里人陳觀見而異之，偕眾舉殮，得香木如人形。因刻像立祠，祈嗣往往有應。祠毀。成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濂重建，稱為金花普主惠福夫人。張詡題詩：『玉顏當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見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1977年），卷六九，頁 1870；另外黃芝《粵小記》解釋「金花夫人」神名的由來云：「神姓金名花，當時人呼為金花小娘，以其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稱夫人云。」見黃芝：《粵小記》，收入吳綺等（撰）、林子雄（點校）：《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卷一，頁 392。

⁷⁵ 潘有為：《南雪巢詩鈔·自注》；轉引自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六，頁 706。

⁷⁶ 嘉靖《廣東通志》卷六九〈雜事上〉載：「嘉靖初，提學魏校毀其祠，焚其像，然廣人篤信於今，立金花會。」（頁 1870）

⁷⁷ 黃芝：《粵小記》，卷一，頁 392。

⁷⁸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 248。

⁷⁹ 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 Co., 1875), p. 98.

(1849)刊刻的崔弼、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也同樣記載：關帝廟「另有廟數處，不主祭於有司。……一在東教場，一在拱宸街，一在南濠街，一在歸德門」。⁸⁰可見東教場有關帝廟一座，而據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拱宸街、南濠街和歸德門的三座關帝廟都坐落在舊城內。此外，舊城內還有兩座關帝廟，其一在育賢坊，其一在清風橋街。育賢坊關帝廟是廣州府內享國家祭祀的官廟，於嘉慶六年(1801)六月建造，以取代地基淺狹的在城隍廟右旁的關帝廟。道光《廣東通志》記載：「嘉慶四年〔1799〕三月，據南、番兩縣稟稱，省會禺山武廟地基淺狹，逢朔望及春秋祭祀，各憲臨詣，每虞擁擠。先經詳明各憲，將〔育賢坊〕舊提督行署拆卸改建。」⁸¹John Henry Gray 在《廣州城之行》中稱讚育賢坊的關帝廟為「廣州城中最精緻的祠廟之一」(“one of the finest in the city of Canton”)，因為「廟內很寬敞，且路面用花崗石板鋪成」(“Its courts are spacious, and, with granite slabs, neatly paved.”)⁸²

總括來說，道光年間在廣州舊城內至少有二十八座祠廟，包括關帝廟七座、文昌宮(廟)三座、藥王廟二座，及其餘各有一座的二聖宮、三元宮、三帝廟、五仙觀、北廟、元妙觀、先鋒廟、東嶽廟、金花廟、城隍廟、月泉(華光)廟、華陀廟、龍王廟、應元宮、雄鎮古廟、醫靈廟(見附表二：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區二十八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新城

根據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的標示，新城區內僅存一座祠廟，新城門外南區則有三座：天后廟，在歸德門外、驛前街之東；洪廟(即洪聖廟)，在新城外新福里；北帝廟，在新城外珠光里東；龍王古廟，在靖海門外河旁。這四座祠廟之外，筆者又據其他志書和文獻，檢出八座道光年間在新城區內存在的祠廟，包括在新城內街的天后廟、大新古廟、太歲廟、馬王廟、藥王廟，以及在新城門外地區的三界廟、文昌宮、金花古廟(見附表三：道光年間廣州新城內、外地區十二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在新城區的十二座祠廟中，首先可注意的是天后廟。據光緒五年(1879)刊刻的瑞麟《廣州府志》，在歸德門外五羊驛(即驛前街⁸³)東的天后廟是於洪武元年(1368)由征南將軍廖永忠興建的。清初，天后是納入祀典之神。康熙十九年(1680)，

⁸⁰ 任果等(修)、檀萃等(纂)：乾隆《番禺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卷八，頁111；崔弼(初輯)、陳際清(續輯)：《白雲越秀二山合志》，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樓西別墅刻本，卷十一，頁四下。

⁸¹ 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四五，頁242。

⁸²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p. 489.

⁸³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四，頁458。

天妃⁸⁴獲加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天妃」；乾隆二年(1737)，又加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天后」。⁸⁵歸德門外天后廟是享受官祭的，光緒《廣州府志》云：「天后宮，在歸德門外，……國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修。歲以春秋二仲癸日致祭，禮儀視名宦祠。」除歸德門外的天后廟外，光緒《廣州府志》還提到：「廟有數處，不主祭於有司，不悉載。」⁸⁶不被光緒《廣州府志》或其他志書記載的幾座天后廟的所在位置，崔弼、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有載：「一在教場旁，一在城西第十舖，一在靖海門內，一在小東門外。」⁸⁷這即是說，在新城區的天后廟，除了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示出在驛前街的一座，還有另一座建在靖海門內，二者的位置其實距離不遠。⁸⁸仇巨川《羊城古鈔》推崇這兩座建於新城區內的天后廟為廣州城區多座天后廟中最为雄壯者：天后宮「在在皆有，而五仙〔即指五羊驛的天后宮〕、靖海兩門內最为雄壯神」。⁸⁹

第二座不為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示出的新城祠廟是珠光里的文昌宮。乾隆三十九年刊刻的任果《番禺縣志》已記載了在小東門外(即雞翼城東南之門)建有一座「珠光殿文昌宮」。黃佛頤《廣州城坊志》更明確指出珠光殿文昌宮坐落在珠光里。⁹⁰據說，文昌宮的內殿名為「珠光殿」，命名於當地士紳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為維護「省城下關風水」而建廟之時，⁹¹「相傳上梁之夕，有珠大如碗，其光竟天，因名」。⁹²雍正十一年(1733)，士紳又於珠光殿後擴建斗魁閣，閣後二百餘步建文昌里和文昌橋。⁹³不同於在舊城內桂香街和府學東邊的兩座官祀文昌宮，新城珠光里文昌宮由地方士紳興建，因此，「向無祀典，每歲春秋致祭皆釀金為之」。⁹⁴為解決祠廟香燈祭祀費用之需，乾隆《番禺縣志》記載，進士凌魚等士紳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募金二百餘兩，置舖屋收租以祀」。這種由民間士紳籌建和募金維持香燈祭祀的地方祠廟，並不在官修志書記載的祠廟之列。

⁸⁴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解釋「天妃」之稱云：「天妃海神，……惟天為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頁212)

⁸⁵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十一。但據乾隆《廣州府志》卷十七：「國朝康熙五十九年加封天后。」(頁五)

⁸⁶ 瑞麟、戴肇辰(主修)，史澄、李光廷等(纂)：光緒《廣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卷六七，頁143。

⁸⁷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十下。

⁸⁸ 參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四，頁490、516。

⁸⁹ 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三，「天后宮」條，頁120。

⁹⁰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四，頁447。

⁹¹ 乾隆《番禺縣志》，卷八，頁113。

⁹²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四，頁447。

⁹³ 乾隆《番禺縣志》，卷八，頁113。

⁹⁴ 同上注。另見《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九下。

筆者從其他文獻檢出的另一座為官方認可的民間神祠廟宇是三界廟，廟址在新城外街石基里，俗稱靈應三界廟，距離珠光里文昌宮不遠。乾隆《番禺縣志》、道光《南海縣志》、光緒《廣州府志》等官修志書都沒有提及石基里的三界廟；惟一例外是宣統《番禺縣續志》引述樊封《南海百詠續編》的記載云：「靈應三界廟，在南關石基里。順治十五年〔1658〕，平藩下佐領白上珩建。廣州三界廟最多，此獨神靈顯赫，故號曰靈應。」⁹⁵筆者檢出廣州新城和城郊共有三座三界廟，一座在石基里，另外兩座在太平門外的十二甫和西砲臺附近。⁹⁶樊封說，創建於清初兩藩兵將攻入廣州城不久的石基里三界廟，「獨神靈顯赫，故號曰靈應」。此外，《南海百詠續編》亦詳細記載了平藩王下水師佐領白上珩興建三界廟的經過。順治九年（1652），白上珩率領水師軍至廣西梧州，大破叛逆李定國。《南海百詠續編》云，白上珩「屯駐一載，時禱於〔三界〕廟，輒有驗應。神座下有青蛇，長尺許，去來無跡，稱為『神使』。欲享祭者必先飼蛇以雞卵，否則神弗歆也。上珩凱旋之日，蛇忽至船。祝之，曰：『爾肯附我返五羊城，即趨吾足。』蛇果緣白足，乃奉以歸，建茲以誌靈應」。⁹⁷三界神廟是明清時期在廣西沿西江水路普及的地方祠廟。⁹⁸三界廟奉祀廣西貴縣人馮三界（名克利）。明代弘治年間，馮克利被敕封為「遊天得道三界真人」；⁹⁹道光十四年（1834），獲敕封為「敷佑伯」；咸豐三年（1853），加封為「敷佑昭顯伯」。¹⁰⁰嘉慶《龍州紀略》卷上〈建置二·廟宇〉載云：「桂林以西沿河建〔三界〕廟，舟子敬事，粵東尤甚。」¹⁰¹趙翼（1727–1814）出仕廣西鎮安府知府時也說：「粵西之梧、潯、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¹⁰²順治十五年，白上珩從梧州凱旋而歸省城，就在石基里建三界廟，這應是廣州城內創建三界廟供奉遊天得道三界真人之始。不過，據陳伯陶的民國《東莞縣志》，三界神信仰不單在廣州府城有所傳播，其實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珠江三

⁹⁵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五〈建置三〉，頁95。

⁹⁶ 見道光《南海縣志》卷三「縣治分界圖」的標示。康熙《南海縣志》載：「三界廟，在城西十二舖。」見郭爾卮、胡雲客（纂修）：康熙《南海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卷二，頁63。

⁹⁷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249。

⁹⁸ 滕蘭花、袁麗紅：〈清代廣西三界廟地理分佈與三界神信仰探析〉，《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頁138–46。

⁹⁹ 民國《永淳縣志》卷三〈禮教〉載：「三界廟在城外西圩，神姓馮，名克利，貴縣人。弘治時入山採藥，遇仙人對弈，得無縫衣一襲。歸家，子孫已易世。言禍福，多奇應。……表聞，敕封遊天得道三界。自省回，至蒼梧江口羽化。今兩廣香祀甚盛。」（轉引自鄭維寬：〈明清時期嶺南三界神信仰考論〉，《嶺南文史》2008年第2期，頁56）

¹⁰⁰ 陳伯陶等（纂修）：民國《東莞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州府縣志輯》影印民國十六年（1927）鉛印本，卷十八，頁九上。

¹⁰¹ 轉引自鄭維寬：〈明清時期嶺南三界神信仰考論〉，頁58。

¹⁰² 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四，「三界廟」條，頁67。

角洲一帶的鄉村如東莞縣，已建有三界廟。民國《東莞縣志》云：「三界廟，在縣東北水南村。明嘉靖三十四年建，天啟七年重修。邑人袁崇煥題有『誠不可揜』額，并有〈重建三界廟疏碑〉。」¹⁰³

石基里三界廟是清初在廣州城始建的專祀三界神的祠廟，新城靖海門外河旁的龍王廟也屬此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有該祠廟的標注。與三界廟建廟的建廟因由相同，龍王廟也是出於兩藩水師率兵西征交趾（越南），渡海遭風，惟禱告海龍王之後，風為之止，士兵無恙，最後水師凱旋回粵，因而建廟酬謝神靈庇佑。《南海百詠續編》云：「海龍王廟，在靖海門外河干。順治十八年〔1661〕，水師游擊易知建。粵省向無龍神專廟，有之自易君始。」¹⁰⁴雍正五年（1727），清廷降旨：龍神散布霖雨，福國佑民，並造各省龍神大小二像，命地方官員恭迎奉祀。於是，廣州府總督阿里袞在舊城粵秀山營建另一座龍王廟。乾隆《番禺縣志》稱：「〔龍王〕廟制宏壯，有司朔望皆詣行香。」¹⁰⁵比較粵秀山和靖海門外的兩座龍王廟，又可知二者由於立廟因由不同，所享受的官祭待遇差別也很大。

與官祭比較，民間百姓對龍王神的奉祀活動卻顯得更為熱鬧，例如美國人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在《舊中國雜記》一書中，描述了1825年至1844年間在舊廣州的生活見聞，他提及1833年（道光十三年），廣州和周圍農村有八個月時間幾乎滴雨未下，於是廣州老百姓禱祀布雨的龍王。亨特描述說：「為了使龍王爺不再無動於衷，人們用一個神龕抬着他上街遊行。神龕後面跟着巨大的人群，拿着點着的香，香煙直熏到龍王的鼻孔裡。龍王陛下全身用油漆重新油過，還描了金，顯出一副莊嚴氣度。喇叭、鑼鼓齊鳴，宣布他的駕到。……到傍晚時才將龍王送回廟裡。」¹⁰⁶雖然亨特沒有說出龍王爺遊行是哪一座龍王廟的活動，但相信這與新城靖海門外街的龍王古廟有關。

最後，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沒有標示出的，但在新城區內屬於「香火至盛」的祠廟，又可舉藥王廟為例。上文提及舊城內有藥王廟二座，分別坐落在大北門內石馬槽和城隍廟左側。¹⁰⁷比較之下，則以新城西橫街的藥王廟歷史最為最古老，而且香火更盛。乾隆《番禺縣志》云：「藥王廟，舊在原番禺縣治，順治十一年〔1654〕

¹⁰³ 民國《東莞縣志》，卷十八，頁八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前，新會縣也建有三界廟。康熙《新會縣志》稱：「三界廟，在知政門外對河。」見賈維英（修）、薛起蛟等（纂）：康熙《新會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影印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卷九，頁210。

¹⁰⁴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249。

¹⁰⁵ 乾隆《番禺縣志》，卷八，頁112。

¹⁰⁶ 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與《廣州番鬼錄》同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71。

¹⁰⁷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十上。

建。康熙二十五年修復縣署，廟遷木排頭。¹⁰⁸木排頭即在西橫街。¹⁰⁹據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康熙二十五年再建於新城內西橫街的藥王廟，是由鑲白旗參領陳萬國及所駐旗軍捐修的。從舊城遷至新城的原因是由於「兩王〔即平南王和靖南王〕以內城為藩城，置百官於新城，遂徙建斯廟，以便民人祭禱」。原本順治年間建於舊城的藥王廟是奉祀藥師如來佛的，但遷至新城西橫街後，藥王廟「用巫師之說，改塑藥聖王」，結果「香火至盛」，「祈藥求醫者遠近沓來，香稅山積」。¹¹⁰所謂「用巫師之說」，相信是採用火居道士或法師之說。據《駐粵八旗志》，西橫街藥王廟所祀的藥聖王是名醫扁鵲：「任邱、鄭州扁鵲祠，俗名藥王廟。相傳四月廿八日為神誕期。康熙中駐防官兵建祠祀之，仍曰藥王廟，招僧人司香火。」¹¹¹然而，由於藥王廟改祀藥聖王扁鵲後，「香火至盛」，歲入頗豐，「寺僧因之致富，亦不肯指神為佛矣」。結果引起道士向官府申訴：「藥聖王，道教也，非釋氏所可司。」對於藥王廟的廟權爭訟案，「祝官不能決。就廟碑察驗，知係旗人創建，乃集旗眾，問所卻與。旗眾曰：『先人以廟與僧，因奉祀光王佛也。今改而祀藥聖王，非先人所敢知矣。然舊制不可忘，仍願與僧。』於是廟歸於僧。主衲遂為不拔之計，改門榜曰『藥王上刹』，後殿添祀觀音、羅漢，以息訟端焉」。¹¹²據此廟訟結果，道光年間，藥王廟雖仍祀藥聖王扁鵲，但兼祀觀音和羅漢，且廟宇管理依然歸於廟僧，並改廟名為佛寺，稱藥王上刹。¹¹³

城外西關

如前所述，清初城西郊外的西關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廣州主要的手工業、商業和住宅聚集的新城區，就正如陳代光所說：「清代，西關平原上、下西關涌地方，已基本成為廣州市市區的組成部分。」¹¹⁴這從道光年間廣州西關地區祠廟數量之眾多和分佈之集中便可得到證明。廣州城郊各區之中，顯然又以城西西關地區比城北郊外和東門外地區更為富庶，經濟和交通更為發達，人口更多。黃佐《廣東通志》就曾比較說：「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東近質，其西過華，其南多貿易之場，而北則荒涼，故諺云：『東村西俏，南富北貧。』」¹¹⁵這種「東村西俏，南富北貧」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以後。以城北郊區為例，裨治文注意到，「最貧窮的人住在邊遠的郊區，沿着幾條濠渠的堤岸，還有的在舊城的北部。他們的房子只是一些小土房——低矮、窄小、黑

¹⁰⁸ 乾隆《番禺縣志》，卷八，頁114。

¹⁰⁹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四，頁483、485。

¹¹⁰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248。

¹¹¹ 《駐粵八旗志》，卷二四，頁202。

¹¹²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248。

¹¹³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載：「藥王廟，即今西橫街藥王古刹。」（頁十上）

¹¹⁴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23。

¹¹⁵ 嘉靖《廣東通志》，卷二十，頁529。

暗、不清潔、沒有任何室內間隔」。¹¹⁶至於西關與東關地區經濟和交通的發展差別，只需著眼道光《南海縣志》記載上下西關共有一百七十條街道的數字，便可知確實有所謂「東村西俏」的地區發展差異，¹¹⁷因為東門外只有十九條街道而已。¹¹⁸然而卻有一些學者基於廣州城郊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作出以下錯誤的結論：「〔廣州城區〕東、北兩方，多為山地丘崗，土質較差；距河較遠，交通不便，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故『村』且『貧』，經濟落後，為全城遊覽點、廟宇、書院集中地區。」¹¹⁹筆者將在下一節討論道光年間廣州城區廟宇的空間佈局特徵及廟宇與街道發展的關係。

不過有一點現在可以明確地提出：廟宇集中地區的形成並不是繫於「『村』且『貧』」的落後經濟因素。相反，在道光年間廣州城內和城郊的七十八座祠廟中，上下西關地區合共有二十五座（見附表四：道光年間廣州城外西關地區二十五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在北門外地區僅有四座，而大東門外地區則有九座（見附表五：道光年間廣州東門外及北門外地區十三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上述廣州地區之間廟宇數字的差距，已經清楚說明了清代廣州城區祠廟之多少應與區內的經濟發展情況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示出在城西的祠廟只有十座，即北帝廟二座，在太平門外新基街及泮塘鄉；孖廟一座，在朝聖古道；洪聖廟一座，在第十舖；相公廟一座，在龍津橋西；醫靈廟二座，在城西門外二里許蘆荻巷及城西高岡；司馬廟一座，在司馬坊左側；曹主娘娘廟一座，在恩州堡繒步；西山廟一座，在第一津草場。筆者又從其他志書、縣治圖、碑刻和文獻資料中檢出十五座廟宇，包括天后廟（宮）四座、三界廟二座、華光廟二座、文昌宮一座、關帝廟一座、城隍廟一座、斗姥宮一座、土地廟一座、瓊花廟一座、離明觀一座。

這二十五座廟宇之中，首先可討論崇禎十五至十六年（1642–1643）創建的關夫子廟（又稱關聖帝君廟）。該廟坐落在下九甫西來初地，即在華林寺左旁。據筆者採集的資料，道光年間廣州城內和城郊合共有十一座關帝廟，其中可考證始建於明代的關帝廟有三座。最早的一座是位於粵秀山麓的關帝廟。據天順五年（1461）廣州通判黃諫（1403–1465）撰〈重修關將軍廟記〉，粵秀山關帝廟為「國〔明〕初都指揮李原自春風橋移建」，¹²⁰後歲久頹圮，景泰五年（1454）黃諫重修。另一座關帝廟位於禺山之麓，坐落在城隍廟的右旁。天順七年（1463）陳洙撰〈重修漢關將軍廟碑〉記載：「〔廟〕積久弊廢。天順六年，征夷總戎都督顏公實來駐節，出囊資，命裨將天台黃著增修

¹¹⁶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267。

¹¹⁷ 道光《南海縣志》，卷六，頁三上至四上。

¹¹⁸ 同治《番禺縣志》，卷三〈輿地畧一〉，頁四上。

¹¹⁹ 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頁122。

¹²⁰ 道光《南海縣志》，卷二九，頁十三上至十三下。另參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932–35。

之。」¹²¹西來初地的關帝廟是第三座在明代時已經在廣州建立的關帝廟。與上述兩座同在舊城內卻久負盛名並且接受官祭的關帝廟不同，始建於崇禎十五年的西來初地關帝廟一直為清代廣州府縣方志所忽略。據筆者所知，記載西來初地關夫子廟的志書只有乾隆《南海縣志》（「關帝廟，……一在西來初地」）和宣統《南海縣志》（「關夫子廟，在下九甫西來初地」）兩部。¹²²難得的是，宣統《南海縣志》的〈金石畧〉保存了由陳似源（康熙四十八年〔1709〕登進士，纂修《大清一統志》）為關夫子廟撰的一通重修碑文〈重修城西關聖帝君祖廟碑記〉。¹²³碑記云：「郡城西郊華林寺左有關夫子廟。」並且記載了該廟始建於崇禎十五至十六年，入清後重修三次：順治七年擴大廟宇規模，增祀華光大帝；康熙十二年增建後殿；第三次則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碑記不只記述了城西關夫子廟的修建歷史，也提及該廟起初是由鄉里父老自發籌建的：「明季壬午〔1642〕、癸未〔1643〕間父老始建，以為坊里會聚之所。」¹²⁴後來，隨著下西關地區的經濟日益發展，十八甫形成新的商業街圩，坐落在下九甫的關夫子廟也受到由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而帶來的影響。碑記又記載關夫子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重修，經費有部份是由城內外「紳士商賈」助捐的：「舊歲壬寅，黃君有章、洪君運楫、林君國梓、陳君邦隆、趙君汝成等捐資，仍募仙城內外紳士商賈，并撤而新焉。」¹²⁵據該碑記，當日的重修共耗費五百餘兩銀以購置木石材料。

其次，下西關地區有兩座華光廟，分別坐落在西關燈籠街和楊仁里，但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沒有標示出它們的所在位置。此外，筆者檢出在道光年間廣州城內和城郊地區至少有另外四座華光廟。合祀華光帝與關聖帝君的祠廟也不少，例如上文提及的豪賢街二聖古廟和下九甫關夫子廟即是。在新城內大新街還有一座大新古廟，明代創建，廟內合祀「文昌、關帝、北帝、華光像」。¹²⁶清代廣州城區祠廟多奉祀華光大帝，此所以崔弼、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稱：「城中祀華光甚多，不獨在月泉〔廟〕，月泉其一耳。」每歲九月十八日，廣州百姓慶祝華光神誕，更出現「城

¹²¹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四〈金石二〉，頁444–45。另參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950–53。

¹²² 魏綰（重修）、陳張翼（彙編）：乾隆《南海縣志》（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複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顯微資料），卷十三，頁十五下；張鳳喈等（修）、桂坵等（纂）：宣統《南海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影印清宣統三年（1911）刻本（上海市：上海書店，2003年），卷六〈建置畧〉，頁184。

¹²³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錄文之末按語云：「右刻在城西西來初地關夫子廟。」（頁321）又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五云：「按：西來初地有關帝廟，廟有雍正元年陳似源撰〈重修記〉云：『郡城西郊，華林寺左有關夫子廟，……』」（頁573）

¹²⁴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頁321。另參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926–27。

¹²⁵ 同上注。

¹²⁶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二二下。

廂內外沿街建醮，供祝陳設甚恭」的盛況。¹²⁷黃芝(1778–1852)《粵小記》載：「里閭於八九月命巫禳火膏以祀華光神。」¹²⁸珠江三角洲一帶普遍奉祀華光大帝，目的是為了祈求禳除火災，原因據說是「粵居於天下之南」，而「南方火紀，又宜祀火神」。¹²⁹華光大帝為火神的信仰，早在明隆慶年間(1567–1572)余象斗編的四卷本章回小說《南遊記》(全名《刻全像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中已提到：「華光乃是火之精、火之靈、火之陽。」¹³⁰不過，在中國宗教傳統裡，司火之神歷來很多，例如炎帝、祝融。¹³¹《大清會典》所列祀典裡的司火之神是神農氏炎帝，有專廟專祭。¹³²道光《南海縣志》云：「〔廣州〕火神廟在府東門外教場後。乾隆二十二年敕建。每歲春秋二仲上丙日致祭。」¹³³據《南海百詠續編》的記載，東門外火神廟「祀祝融炎帝者也」。¹³⁴華光雖係火神，卻從來不被列入祀典之內，那麼為何華光神能在廣州城及珠江一帶縣鄉地區得到廣泛的供奉祭祀？黃芝《粵小記》中的解釋提供了一種參考。他認為華光神本為西方金神，從其神像為「白晳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可推證之(見圖片一)。黃芝以五行理論進一步說明：「火本炎上之物，流於西則為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為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為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即燦燦之謂也。」¹³⁵至於世人把原屬金神的華光神奉祀為

¹²⁷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十上。

¹²⁸ 黃芝：《粵小記》卷一，頁393。

¹²⁹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九下。

¹³⁰ 余象斗：《南遊記》，收入《四遊記》(臺北：世界書局，1958年)，第五回〈華光鬧天宮燒南天寶得關〉，頁66。

¹³¹ 樂保群《中國神怪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火德星君」條云：「《神誕譜》：火德真君，為炎帝神農氏之靈，祀之為火神，以禳火災。」(頁211)「祝融」條云：「《山海經·海外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云：火神也。」(頁713)

¹³² 崑岡等(修)、吳樹梅等(纂)：《欽定大清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石印本，卷三五，頁323。

¹³³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九上。

¹³⁴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頁251。

¹³⁵ 黃芝：《粵小記》，卷一，頁393。黃芝之說只是眾多有關華光神的解釋之一。關於華光神及其複雜的來源，特別是華光神與五顯神及伽藍神之間的關係，中外學者研究成果甚多，例如：二階堂善弘：〈靈官馬元帥華光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別冊》第18集(1991年)，頁23–35；二階堂善弘：〈靈官馬元帥華光統考〉，《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5號(1996年)，頁1–16；黃兆漢：〈粵劇戲神華光考〉，載黃兆漢：《道教與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頁155–89；Ursula-Angelika Cedzich, “The Cult of the Wu-t’ung/Wu-hsien in History and Fiction: The Religious Roots of the *Journey to the South*,” in David Johnson, ed., *Ritual and Scriptur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Five Studies* (Berkeley, CA: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1995), pp. 137–218;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1 (February 1997), pp. 113–35。

火神，原因是華光神極為靈驗。黃芝說：「然〔華光〕神固靈著也，遇火災之際，籲神呼救，無不立應，雖然燒成墟，而神廟巍然獨存，故窮荒僻壤莫不建廟以祀。」¹³⁶

當然在廣州城地區建立的華光廟並非如黃芝所說的位於「窮荒僻壤」，但是所謂遇火災之際，華光神顯靈，「雖然燒成墟，而神廟巍然獨存」的靈異事蹟卻發生在西關燈籠街華光廟。道光二年，西關太平門外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火，把建在西南城郊西濠西側近江邊的十三行街區¹³⁷（即外國商館區，包括十三行大街、同文街、靖遠街、新豆欄街）的商館、洋行、民居和店鋪，大部份燒毀。黃芝《粵小記》記述了這場大火殃及地區之廣袤及災情之嚴重：「道光壬午九月十八日〔1822年11月1日〕，會城西關火，三晝夜始熄，毀民舍萬七千六百餘間，西至西寧堡，南至佛山渡口鬼驛尾，東至回瀾橋，北至第八甫，男女民夷焚死百餘。……吾粵自有火災以來，莫此為甚。」¹³⁸大火亦禍及十三行商館街，曾在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服務的美國人莫爾斯（Hosea B. Morse, 1855–1934）這樣記述：「十一月一日黃昏九時半，外國商人接到消息，北面約一哩半的地點失火。……到了〔翌日〕九時，英國館內已有五、六個火場，而整個商館區由小溪至靖遠街茂官的商行都被火焰包圍著。」¹³⁹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也提及大火造成十三行商館區巨大的財物損失：「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¹⁴⁰道光二年西關城郊的大火波及區內兩座祠廟，即在燈籠街的華光廟和新基街渡頭的北帝廟。大火雖然燒毀了燈籠街的店鋪和民房，華光廟卻能巋然獨存，廟門無燬，人們相信是得到華光神的特別庇祐。同治《南海縣志》記載了這宗華光神顯靈的故事：「西關登龍巷華光廟不甚宏敞，亦未聞特著靈異。道光壬午大火，延燒神廟殆百區，顧巋然獨存，十餘里斷井頽垣，彌望左右，鄰鋪一空，而門樓棖桷無燬者，廟外懸燈籠二，尚依然也。會城人特詣瞻之。」¹⁴¹

在城西上、下西關的二十五座祠廟之中，以北帝廟為最多，共有四座，全部都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出現標注，相信這是因為北帝在祀典之列。如道光《南海縣志》云：「案會典，北帝廟為群祀。」¹⁴²這四座北帝廟就是城西第一津的西山廟、西

¹³⁶ 黃芝：《粵小記》，卷一，頁394。

¹³⁷ 「十三行」並非指十三間洋行，不過是洋行的代名詞。梁廷枏《粵海關志》云：「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見梁廷枏（總纂）、袁鍾仁（校注）：《粵海關志：校注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91。

¹³⁸ 黃芝：《粵小記》，卷二，頁417–18。

¹³⁹ 轉引自香港藝術館（編）：《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頁174。

¹⁴⁰ 錢泳（撰）、張偉（校點）：《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91。

¹⁴¹ 同治《南海縣志》，卷二五，頁429。另參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五，頁588。

¹⁴²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十四下。

關朝聖古道的孖廟、大門外新基碼頭的北帝廟和泮塘鄉的仁威廟。道光《南海縣志》記載：「北帝廟，一在太平門外新基街；一在城西第一津草場，汎名西山廟。」¹⁴³ 上西關第一津即為第一舖，由於第一舖地處通向越秀山腳蘭湖的水道，所以習慣上稱為通津，所以叫第一津。¹⁴⁴ 至於孖廟，只見於宣統《南海縣志》的記載：「雞欄孖廟，在西關朝聖古道，奉祀真武。」¹⁴⁵ 雖然泮塘鄉仁威廟始創於明神宗萬曆年間（1573–1620），¹⁴⁶ 但由於位處西郊偏遠的恩洲堡鄉村，歷來廣州府縣志都沒有提及，直到同治十一年刊刻的《南海縣志》才加以記載：「北帝廟，一在恩洲堡泮塘鄉，署曰仁威，祀產頗饒。」¹⁴⁷

從同治《南海縣志》開始記載入仁威廟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些祠廟在社會發展中的轉變過程：自清初順治以來，西關地區的商業發展、住宅街區的開闢和道路的修建成路等改變因素，亦造成泮塘鄉仁威廟不斷在這個城市發展中被劃入廣州城市的範圍。¹⁴⁸

北帝崇拜是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最主要的民間信仰之一。¹⁴⁹ 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云：「吾粵多真武宮，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為大，稱曰祖廟。其像被髮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¹⁵⁰ 根據同治《南海縣志》的記載，單在南海一縣各鄉建立的北帝（真武）廟，就有二十九座之多。¹⁵¹ 對於為何北帝信仰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得到普遍接受，最常引用的解釋是依據屈大均之說：北

¹⁴³ 同上注。乾隆《南海縣志》卷十三亦記載：「北帝廟，在太平門外新基街。」（頁十五下）

¹⁴⁴ 《廣州市荔灣區志》，頁78。

¹⁴⁵ 宣統《南海縣志》，卷六，頁184。

¹⁴⁶ 廣州荔灣區仁威廟現藏有一通明天啟二年（1622）的〈重修真武廟記〉，其中有云：「恩洲堡泮塘鄉，先年建泮真武帝廟。」碑文收錄在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244–48。關於泮塘鄉仁威廟的歷史，參黎志添：〈現代都市中道教廟宇的轉型——從村廟到道觀：以廣州市泮塘鄉仁威廟為個案〉，《道教研究學報》第4期（2012年），頁127–73。

¹⁴⁷ 同治《南海縣志》，卷五，頁120。

¹⁴⁸ 黎志添：〈現代都市中道教廟宇的轉型〉，頁148–49。

¹⁴⁹ 劉志偉：〈神明的正統性與地方化——關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北帝崇拜的一個解釋〉，載中山大學歷史系（編）：《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8。關於北帝信仰的歷史發展，參黃兆漢：〈玄帝考〉，載黃兆漢：《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21–56；莊宏誼：〈元代道教玄天上帝信仰研究〉，載陳永源（主編）：《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年），頁121–57；楊立志：《武當文化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93–103；肖海明：《中樞與象徵：佛山祖廟的歷史、藝術與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10–24；肖海明：《真武圖像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20–66。

¹⁵⁰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神語〉，頁208。

¹⁵¹ 同治《南海縣志》，卷五，頁119–25。

帝雖是北方黑帝，但身兼水神，故此在廣東水鄉地區受到尊崇。¹⁵²從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來看，如曾昭璇所說：「廣州地瀕南海，當三江總匯，故很易成災；洪水為害，史不絕書。淫雨、大雨、颶風、龍舟水、西水、小滿水、沓潮、特大潮水、山洪都可成為古代廣州洪水為患的原因。」¹⁵³以太平門外新基街北帝廟為例，該廟就是建於新基街碼頭旁的。據光緒《廣州府志》，來往澳門、香港、東莞、恩平等地的貨船火輪都在此碼頭啟航。¹⁵⁴該區不僅有新基街碼頭，本身也是廣州沿江碼頭區，建有諸如外商專用貨物裝卸的十三行碼頭。¹⁵⁵梁廷枏(1796–1861)《粵海關志》稱，該碼頭是進入廣州柳波涌水道後洋船下貨、接受稽查和徵納稅銀的口岸之一；¹⁵⁶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就標示出在新基街北帝廟旁設立有廣州府稅館。不僅如此，新基街亦接連杉木欄、興隆街和十三行街。由於地處外國商館區，這些街道都是廣州主要的商業興盛區。如前所述，道光二年一場大火就把十三行街區大部份的商館、洋行、店鋪燒毀，新基街北帝廟也不能倖免。吳榮光(1773–1843)《石雲山人文集》卷二收錄一通由他所撰的〈重建廣州城西真武廟碑記〉，碑文云：「廣東省城郊外新基古渡有真武帝廟，自嘉慶丁巳重修後，道光壬午，居民不戒於火，圮及廟垣。鄉人捐貲修復，凡七千餘人，得銀三萬兩有奇。鳩工庀材，更於廟旁拓闢四基，添建後殿。趨將踴躍，鑿鼓弗勝，俾壯俾麗，俾堅俾固，美哉燦爛，神明之式。」¹⁵⁷這篇碑文記述了道光二年大火之後，被燒毀的北帝廟因得到鄉民踴躍捐貲而得以迅速重建。吳榮光所說的七千多名捐貲重建祠廟的「鄉人」，必然包括了許多在該商業區的旅粵商賈和店鋪東主。香港藝術館曾展出一幅描繪1822年商館區被熊熊烈火包圍的著名油畫〈廣州商館——烈火蔓延〉(“The Canton Fire of 1822”)，其文字介紹說：「此次大火期間，超過七千名店主從商舖逃出。」¹⁵⁸為了重修已燒毀的廟宇而募得的助銀金額是非常龐大的，碑文說「得銀三萬兩」。重修後的新基街北帝廟更為壯觀：「廟旁拓闢四基，添建後殿。」北帝廟在四周拓闢地基，原因相信是為了在神誕報賽之時，在廟前能夠搭建更大的戲台(見圖片二)。據梁佩蘭(1629–1705)撰〈金花廟前新築地基碑記〉，在珠江南岸石鰲村的花

¹⁵²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云：「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極，北極為源而南溟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粵固水國也，民生於鹹潮，長於淡沔，所不與鼃蠃蛟蜃同變化，人知為赤帝之功，不知為黑帝之德。家戶而戶祝之，禮雖不合，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頁208)

¹⁵³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199。

¹⁵⁴ 光緒《廣州府志》卷六八載：「澳門渡四、火輪船一、香港火輪船二，俱在新基渡頭。」(頁167)

¹⁵⁵ 關於清代時期珠江北岸的碼頭區，參《廣州市荔灣區志》，頁83–84。

¹⁵⁶ 梁廷枏：《粵海關志》，頁66。

¹⁵⁷ 吳榮光：《石雲山人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吳氏筠清館刻本，卷二，頁76。

¹⁵⁸ 香港藝術館：《珠江風貌》，頁176。另參 Patrick Conner, “The Fires of Canton in ‘Export’ Paintings,” *Arts of Asia* 3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pp. 110–23。

廟亦是因為廟址狹隘，乃於康熙三十年間重修擴充，並在廟前構築地基，以便在金花神誕之時，「烟花火爆，百戲駢集」。¹⁵⁹北帝廟重修之後經過五十年，同治《南海縣志》描述當時新基街北帝廟依然是廣州地區香火最為鼎盛的祠廟；它在神誕報賽時的熱鬧盛況，更幾與佛山真武祖廟看齊：「粵俗佞神，而奢侈奢靡特甚。二月二日，土地誕大爆，則以佛山真武廟暨新基渡頭廟為最。」¹⁶⁰每年二月二日是土地誕辰，廣州民眾視之為祭神的重大節慶日，新基街固然熱鬧非凡，城內各街道也爭相放砲慶祝。陳坤（1821-?）《嶺南雜事詩鈔》這樣記載廣州城這一節日的盛況：「各街放花砲，置草圈於其上，砲震圈飛，接獲者主招財喜。另有紙紮砲頭，綴以人物花卉，高數尺，鼓吹送至家中，供奉神前，謂之接砲頭。」¹⁶¹

西關地區的祠廟群不獨有四座北帝廟，而且有四座天后廟，允為特色。上文引光緒《廣州府志》云：「〔天后〕廟有數處，不主祭於有司，不悉載。」正如大多數民間祠廟一樣，西關四座天后廟沒有被記錄在大部份的方志裡。例如道光《南海縣志》，不僅在卷四〈壇廟〉中沒有收錄這四座天后廟，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也沒有加以標示。筆者只能從乾隆《南海縣志》和《白雲越秀二山合志》二書中找到這四座天后廟及其所在處，分別如下：（一）乾隆《南海縣志》記：「天后廟，一在城西十三舖，一在懷遠驛街，一在城西十七舖。」¹⁶²（二）《白雲越秀二山合志》記：「〔天后宮〕一在城西第十舖。」¹⁶³據《廣州城坊志》，懷遠驛街在西關第十八舖（按舖即甫）。¹⁶⁴由此可知，在西關第十舖、第十三舖、第十七舖和第十八舖都建有天后廟。據曾昭璇說，明清以後，雖然西關十八舖已發展成為「街圩」商業區，但是這十八個舖即十八條街的排列，是依河流從北至南向依次而建的。十八個舖之外，即為農村地區。¹⁶⁵隨著西關商業的發展，人口增加，街道建成。雖然大量土地被開發，但是直到道光朝之前，上、下西關的農田與村落仍佔很大的面積，村民還需要築起不少防洪排澇的堤圍。¹⁶⁶因此之故，村民在第十舖、第十三舖、第十七舖和第十八舖等村落都建有天后廟，以供奉水神天妃，禳解洪水之災。今廣州市海珠區小洲村東渡大街3號有一座天后

¹⁵⁹ 梁佩蘭：〈金花廟前新築地基碑記〉，載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六〈金石四〉，頁487-88。另見黃任恒（編纂），黃佛頤（參訂），羅國雄、郭彥汪（點注）：《番禺河南小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卷七，頁306-7。

¹⁶⁰ 同治《南海縣志》，卷二六，頁432。另黃佛頤《廣州城坊志》收入此條，見卷五，頁630。

¹⁶¹ 陳坤（著）、吳永章（箋證）：《嶺南雜事詩鈔箋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92。

¹⁶² 乾隆《南海縣志》，卷十三，頁十四下。

¹⁶³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十上。

¹⁶⁴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五，頁592。「懷遠驛」一名見《明史·食貨志五》：「〔永樂〕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980。

¹⁶⁵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頁382。

¹⁶⁶ 《廣州市荔灣區志》，頁77-78。

廟，廟內仍存有一通乾隆二十七年(1762)撰寫的〈重修天后廟碑記〉。碑文云：「廟號天后者，謂夫天之尊無上，天之功無兩，而神以坤職配天，嘉惠旁流，功無兩，所以尊亦無上也。故自城都迄諸村落，悉皆尸祝為虔。禱求每應，呵之護之，而海隅江鄉幸免於洪濤巨浸、蛟蜃魚鱉患者，神之功尤著焉。」¹⁶⁷

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佈局特徵

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示了三十六座祠廟的位置所在，但正如上文所說，可以確定的在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的祠廟數目不止於此，總數至少有七十八座之多。基於這批新增的廟宇資料，下文將對這七十八座祠廟在廣州城區空間分佈的意義作進一步的探討。廟宇的建立和發展本身就具備了各種空間訊息，筆者希望可以從道光年間廣州七十八座祠廟的分佈情況和個別廟宇之間空間位置的關係等角度，整理出一個廣州廟宇存在空間的動態架構。

按專祀的神明種類來分類，這七十八座廣州城區祠廟包括十一座關帝廟、八座天后廟、七座北帝廟、五座文昌廟、四座華光廟、三座藥王廟、三座三界廟、三座醫靈廟、兩座金花廟、兩座斗姥宮、兩座城隍廟、兩座洪聖廟、兩座龍王廟，合共五十四座。其餘二十四座祠廟所供奉的神明各有不同，部份或有一廟奉祀多位神明，如坐落在舊城大石街的三帝廟，祀文昌、北帝、關聖三帝；¹⁶⁸ 在新城內街大新街的大新古廟，合祀文昌、關帝、北帝、華光。¹⁶⁹ 這餘下的二十四座祠廟包括二聖宮、三元宮、三帝廟、土地廟、五仙觀、牛王廟、太歲廟、火神廟、元妙觀、司馬廟、先鋒廟、東嶽廟、相公廟、風神廟、馬王廟、華陀廟、張仙廟、應元宮、紫微廟、曹主娘娘廟、瓊花廟、離明觀、雄鎮古廟、大新古廟（見附表一：道光年間廣州城區七十八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本文以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作為道光年間廣州城地理範圍的指標，從城區的劃分來判辨這七十八座祠廟的分佈位置，則舊城內有祠廟二十八座，新城內街和外街合共有十二座，城西西門外上、下西關合共有二十五座，北門外區有四座，東門外街有九座。舊城內的祠廟數目最多，佔祠廟總數的36%。舊城區佔有這個比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廣州建城歷史久遠。唐代廣州城已有很完整的城垣規模，¹⁷⁰ 及至兩

¹⁶⁷ 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110。據筆者在2011年實地考察，小洲村東渡大街天后廟尚存，然已失修，被封閉。但據冼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446，〈重修天后廟碑記〉在2006年仍存於天后廟內。

¹⁶⁸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一，頁112。

¹⁶⁹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二二下。另見《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十下。

¹⁷⁰ 關於唐代廣州城的發展情況，參徐俊鳴：《嶺南歷史地理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0年），頁14；程存潔：〈唐代嶺南道城市發展論略〉，載蕭亢達（主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州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10-19。

宋三百多年間，廣州城垣擴建和修築有十餘次之多，特別是從北宋慶曆四年（1044）至熙寧四年（1071）的三十年間，廣州城先後修築和增建了中城（又稱子城）、東城和西城，是為「廣州三城」。¹⁷¹明代洪武初年，把宋代三城連合為一，¹⁷²奠定了清代舊城區的基本輪廓。據方志或碑刻資料記載，在舊城內，可確知在明代或以前已經建立的祠廟有元妙觀（淨慧街）、三元宮（粵秀山麓）、文昌廟（桂香街）¹⁷³、文昌宮（衛邊街）¹⁷⁴、五仙觀（十賢坊）、北廟（大北門直街）、東嶽廟（布政司後街）、金花廟（仙湖街）、都城隍廟（惠愛街七約）、藥王廟（城隍廟右旁）、關帝廟（越秀山麓）、關帝廟（城隍廟右旁）、雄鎮古廟（大南門內雄鎮坊）¹⁷⁵、先鋒廟（小北門內鬻橋）¹⁷⁶，一共十四座。

在舊城內的其餘十四座祠廟，相信是在清初以後建成的，例如在廣州府學宮東邊的文昌宮，據《白雲越秀二山合志》稱：「嘉慶初，因桂香街廟宇〔文昌宮〕湫隘，另建於府學東邊，藩司康公基田所擇地也。」¹⁷⁷可見是建於嘉慶初的。此外，由清初官方兩藩、總督興建或擴建的祠廟，最明顯的例子有粵秀山下的四座祠廟：龍王廟、應元宮、三元宮、關帝廟。粵秀山龍王廟始建於雍正三年（1725），原建在巡撫東轅門，乾隆元年（1736）由廣州府總督阿里袞移建於粵秀山，且稱：「廟制宏壯。」¹⁷⁸應元宮順治十七年（1660）由平南王尚可喜下令興建。¹⁷⁹至於粵秀山下關帝廟和三元宮，則分別於清初順治十一年和十三年（1656）得到廣東欽差巡撫李棲鳳（?-1664）的支持重修殿宇。宣統《南海縣志·金石略》收錄一通順治十一年李棲鳳撰

¹⁷¹ 根據大德《南海志》卷八頁21-22的記載：（一）北宋慶曆四年（1044）魏瓘修築子城，周環五里；（二）北宋熙寧三年（1070），即州東古城（趙佗城）遺址築東城，廣袤四里；（三）熙寧四年（1071），繼於子城之西增築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是為三城。

¹⁷² 萬曆《廣東通志》卷十五載：「國朝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揮使許良、呂源，以舊城低隘，上疏請，乃連三城為一。」（頁368）

¹⁷³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載：「文昌宮，在惠愛坊桂香街口，故又名桂香宮，成化十二年建。」（頁九上）

¹⁷⁴ 乾隆《番禺縣志》卷八載：「文昌宮，在衛邊街，成化十二年建，順治十三年重修。」（頁113）

¹⁷⁵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載：「雄鎮古廟，在大南門內，前明建，道光二十八年重修。祀觀音、武帝、金花普主。」（頁十下）

¹⁷⁶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三〈神廟〉載：「先鋒廟，在小北門內鬻橋側，里人建，祀宋末急脚先鋒楊四爺爺者。碑云：『神宗末時為裨將，有國功。死之日，服嶺以南，咸享祠之。』明初邵宗愚之亂，神率陰兵以禦賊，故祭賽尤赫，而祭必以犬。右班勇爵，奉之彌謹。」（頁258）又見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五〈建置三〉，頁94。

¹⁷⁷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九上。另見同治《南海縣志》，卷五，頁119。

¹⁷⁸ 乾隆《廣州府志》，卷十七，頁四下。

¹⁷⁹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頁十二下。

〈重修張桓侯廟記〉，而張桓侯廟在萬曆十七年(1589)已建在關帝廟內。¹⁸⁰宣統《番禺縣續志》收錄另一通順治十三年李棲鳳撰〈修建三元殿記〉，碑文稱：「議城北觀音山之陽，集建太上三元寶殿。登高極目，烟火蒼茫，引眾善之攸歸也；入廟瞻崇，莊嚴輪奐，攝百念之思敬也。且以神道設教，而必皈奉三元大帝者。」¹⁸¹

如前所述，舊城乃是廣州府的軍事和政治中心。康熙二十一年撤除藩府之後，巡撫李士楨「命文武各官入內城設立官署」。沿惠愛街自東而西的官署分布，有番禺縣署、布政司署、廣州府衙、巡撫部院、將軍署、漢軍副都統署等。此外，從大北門至歸德門止的大北門直街以西地區盡屬滿、漢八旗軍駐防的旗境。從這種以官方統治為中心的地理規劃來說，我們可以理解，除開仍存在的一些明代或以前已經建立的祠廟，清初以來在舊城內的祠廟，大多數是由官方兩藩、總督興建或擴建的。除了學府宮東邊的文昌宮和粵秀山下的四座祠廟（龍王廟、應元宮、三元宮、關帝廟），舊城內祠廟受到官方官將支持或是創建或是重修擴建的，還有在惠愛坊桂香街口的文昌宮。該廟先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巡撫李士楨重修，並存有蔣伊(1631–1687)撰的〈重修文昌宮碑記〉；¹⁸²之後在雍正七年(1729)，又由巡撫傅泰、布政司王士俊重修。¹⁸³此外，在淨慧街的古道觀元妙觀，¹⁸⁴由於清初曾遭兵燹之禍，觀內殿宇建築幾至盡毀，凋零如荒野，乃於康熙五年(1666)由平南王尚可喜重修，並存有一通由尚可喜撰的〈重修玄妙觀記〉碑。¹⁸⁵《南海百詠續編》記述元妙觀云：「康熙五年，平藩肇修廢祀，是觀聿新，視舊制有加。勒碑琪林門內，紀述頗詳。」¹⁸⁶至於在大北門直街的北廟，則是由於明末毀於李成棟的兵亂，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駐防參領高登修復。一直到道光年間，北廟仍然是「規模雄駿，香火至盛」。此外，在惠愛街七約的都城隍廟，也是一座與官方關係密切的祠廟（見圖片三）。自「明洪武三年〔1370〕，詔封天下省府州縣城隍之神」後，就規定「〔縣〕守令新任，齋宿於

¹⁸⁰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金石畧二〉，頁311–12。另見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939–40。據萬曆十七年劉繼文撰〈〔粵秀山〕張桓侯碑〉，兩廣總督劉繼文因得張桓侯降鸞昭示，結果用兵征蜀而得捷，因而在粵秀山關帝廟旁建張桓侯祠。見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二〈金石畧一〉，頁297。

¹⁸¹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六〈金石四〉，頁474。另見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40–42。

¹⁸² 乾隆《廣州府志》，卷五七，頁十三上至十四上。另見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333–35。

¹⁸³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十上。

¹⁸⁴ 關於廣州元妙觀的歷史變遷，參黎志添：〈廣州元妙觀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9月），頁445–513；收入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56。

¹⁸⁵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金石畧二〉，頁314–15。

¹⁸⁶ 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卷二〈道觀〉，頁244。

此」。乾隆十八年(1753)，進士凌魚因集合士紳向官府呈請捐修都城隍廟，總計用了一萬二千兩。該廟現存有由官至福建巡撫的莊有恭(乾隆四年〔1739〕廷試第一名賜進士)撰寫的〈重修城隍廟記〉。¹⁸⁷碑文稱：「廣州城隍廟在省會之中，凡督撫大吏以及監司守令，歲時月吉，展謁維虔。」道光崔弼、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同樣記載廣州府縣官必恭必敬地按時供祀城隍神：「縣官蒞任先夕，齋宿廟中。朔望，必展謁。凡遇祈晴禱雨，禁屠宰，各官齋戒，入廟拈香。」¹⁸⁸最後，還有北宋始創且一直保存至今的五仙觀。五仙觀坐落在城西十賢坊(今惠福西路)，處於滿州軍旗境，滿州軍副都統署在其右。因此入清之後，五仙觀經過的幾次重修，都是主要由官府文武官員支持和助捐的。已知的有順治十二年(1655)耿繼茂的重修，雍正元年(1723)提督馮毅的重修，嘉慶十七年(1812)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燠的重修，以及道光二十五年(1845)廣東巡撫黃恩彤的重修。¹⁸⁹黃恩彤撰〈重修五仙觀碑文〉說明了五仙觀與官府的密切關係：「我朝自定粵撤藩，移駐八旂滿漢勁旅，特置將軍、兩都統，率協領以下各官治之，將以建威銷萌，靖內攘外。二百年來，翼翼濟濟，克壯其猷。而五仙觀適當將軍署之西南隅，官民瞻禮，後先相屬，禱雨祈晴，如響斯應。」¹⁹⁰

從舊城內二十八座祠廟的空間分佈、所在的街道位置，以及個別專祀神明的廟宇數目等資料，可以推測上述祠廟或屬官廟，或與官府大吏往來密切。如從〔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標示的關帝廟位置來看，全廣州城區總共有關帝廟十一座，其中七座建在舊城內，其餘四座，分別在小北門外有二座(即東得勝廟和西得勝廟)，下西關有一座(關夫子廟)，東門外校場有一座(見地圖六：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十一座關帝廟分佈位置)。換言之，舊城內的關帝廟佔了關帝廟總數的64%。除了已經提及過的坐落在越秀山麓、城隍廟之右及育賢坊這三座關帝廟，其餘四座關帝廟分別坐落在南濠街、拱宸街、歸德門和清風橋。¹⁹¹舊城內這七座關帝廟都是專祀關帝的，上文提及的豪賢街二聖宮、大石街三帝廟、大南門內雄鎮古廟則是合祀關帝、文昌和華光等神明的。¹⁹²此外，據仇巨川《羊城古鈔》，雍正年間五仙觀內也建

¹⁸⁷ 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四五，頁243。

¹⁸⁸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六上。

¹⁸⁹ 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215-32。

¹⁹⁰ 碑文輯錄自原碑，碑存五仙觀內。碑有四通，第一碑錄正文，高245厘米，寬145厘米；第二碑錄官紳善信所供供器，高176厘米，寬80厘米；第三碑錄捐助工金官紳名單，高173厘米，寬80厘米；第四碑錄捐助芳名，立石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高93厘米，寬36厘米。另碑文又見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金石畧二〉，頁339-40。

¹⁹¹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載：「〔關帝廟〕另有廟數處，不主祭於有司。……一在東教場，一在拱宸街，一在南濠街，一在歸德門。」(頁四下)

¹⁹² 《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載：「在前明建，道光二十八年重修。祀觀音、武帝、金花普主。」(頁十下)

有關帝殿。¹⁹³據上述的資料，可知在舊城內的二十八座祠廟中，有十一座奉祀關帝；換言之，舊城內約有40%的廟宇是建立在以關帝崇拜為中心的信仰傳統之上的。〔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展示出七座關帝廟的位置，其中三座處於重要的衙門附近：城隍廟右的關帝廟近布政司署；育賢坊關帝廟建於舊提督行署，即在廣府學宮右；清風橋關帝廟位於廣東巡撫部院前（撫臺前街）。¹⁹⁴此外，據宣統《番禺縣續志》，粵秀山麓的關帝廟「屬駐防旗人香火」。¹⁹⁵

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的專祠廟宇以關帝廟、天后廟、北帝廟、文昌廟及華光廟為最多，關帝廟有十一座，天后廟八座，北帝廟七座，文昌宮五座，華光廟四座。值得注意的是，舊城內沒有天后廟，而北帝廟和華光廟各只有一座（即在大北門直街的北廟及馬鞍街的月泉古廟）。相反，在舊城內專祀關帝的廟宇卻有七座，而合祀關帝和其他神明的另有四座。奉祀關帝的廟宇竟佔了舊城內二十八座廟宇的40%。這種以舊城為中心的關帝祠廟分佈面貌，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舊城內主要的關帝廟處於重要的衙門附近；另一方面，在清代，關帝接連被加封，列入國家祀典，備受崇祀。因此，祭祀關帝已屬於國家的祭禮儀式，如道光《南海縣志》記載了在育賢坊關帝廟的祭禮法：「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五月十三日致祭，縣官隨院司、道府行禮。……祭日，贊引官引承祭官進左旁門，至盥洗所。盥洗畢，引至殿內行禮處立。……承祭官上炷香於鑪內，又三上瓣香。……承祭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祭禮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聖大帝之神。曰：『惟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大節以篤忠貞，名高三國。神明如在，遍祠宇於寰區；靈應丕照，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蹟，顯佑群生。』」¹⁹⁶嘉慶十九年（1814），關羽受清廷敕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聖大帝」。不過，早在順治九年，關羽已被封為「忠義神武大帝」。¹⁹⁷順治九年的敕封，與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繼茂於順治七年十一月共同攻下廣州城不無關係。廣州城小北門外建有兩座關帝廟，稱東德勝廟和西德勝廟，是尚可喜和耿繼茂於順治九年為紀念庚寅（順治七年）之役克定廣州而建的。¹⁹⁸尚、耿二人刻立了一通〈新建東西得勝廟碑〉，碑文云：「今上七祀，庚寅暢月二日，始恢復

¹⁹³ 仇巨川《羊城古鈔》卷三「五仙觀」條云：「〔五仙觀〕內有玉皇閣、五仙祠、三元殿、老君堂、慈悲堂、真武殿、文昌閣、洪聖殿、金花廟、孫聖殿、關帝殿、御風亭、仙人跡、穗石亭、丹井、祖師壇。」（頁233）

¹⁹⁴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卷二，頁209–10。

¹⁹⁵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五〈建置三〉，頁90。

¹⁹⁶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¹⁹⁷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四，頁632。

¹⁹⁸ 同治《南海縣志》卷五云：「東西得勝廟在小北門外一里，雙峯雄峙，高瞰仙城。庚寅之役，兩藩前鋒爭卡處也。奠定之後，東西各建得勝寺，以祀忠武焉。（據《恭巖札記》脩）」（頁119）

粵省，武奮文揆，兆民憬化。暨三稔，乃建得勝廟於舊營白雲山之麓，以崇祀關帝，志不忘宣佑也。」¹⁹⁹此碑不僅記載了順治七年兩藩共同攻下廣州城的整個戰爭經過，並且把戰事的勝利歸託於關帝的眷祐：「帝之大有，造於我師也。」為何這場戰役會得到關帝的眷祐？尚可喜解釋說：「因惟予與靖藩，自北而南，常默有契於帝令者。」據此，清軍攻克廣州城或可為關帝信仰在廣州城大行其道的歷史背景提供一個解釋。²⁰⁰廣州城粵秀山麓的關帝廟存有一通在康熙十一年（1672）刻立的〈崇祀關帝廟永旋祖案碑記〉，此碑記載了順治七年清軍攻克廣州城後，諸將領輪流奉祀關聖帝之事。此事始於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十一年輪畢，因而刻碑紀念。碑文云：「庚寅歲，王師恢粵，城悉住兵，歲時香火，不無稍異。」²⁰¹滿清視關羽為國家戰爭的勝利之神，入關即予以敕封，並在繼後的平定青海、臺灣、西藏和西蜀的多場戰爭勝利之後，把關羽崇拜推上了歷史的最高峰。²⁰²在這個推動過程中，廣州城的地方官吏必然成為最大的響應力量之一。對廣州城統治者來說，關帝是護國之神；而從廣州城的歷史角度來說，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更是此粵地古城的保護神。粵秀山麓的關帝廟存有一通由李天培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撰寫的〈粵秀山武廟重修碑文〉，稱關聖大帝為「全省之福神」，「凡口士商民，所有祈禱，感而遂通」。²⁰³這種結合國家化和本地化的關帝崇拜論述，說明了為何奉祀關帝的廟宇竟佔了廣州舊城內二十八座廟宇中的四成之多。

廣州城區祠廟的整體分佈特徵，除舊城內主要以關帝崇拜為中心的祠廟傳統外，天后廟和北帝廟所具有的空間分佈意涵也值得探討。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有八座天后廟和七座北帝廟，二者合計起來的數量超越了十一座的關帝廟，因此可以說，清代廣州地區的天后和北帝崇祀也是非常普遍的。如上文引仇巨川云，天后宮「在在皆有，而五仙、靖海兩門內最為雄壯神」；以及屈大均稱「吾粵多真武宮」。但是在這十五座天后廟和北帝廟之中，卻只有一座北帝廟是位於舊城內大北門直街

¹⁹⁹ 同治《南海縣志》，卷十二，頁199。另見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700–702。

²⁰⁰ 關於關帝作為清代國家戰神的研究，參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4 (November 1988), pp. 778–95。

²⁰¹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金石畧二〉，頁316。

²⁰² 廣州城內豪賢街二聖古廟存有一通黃大幹於道光十六年撰的碑記，稱〈重建豪賢街二聖古廟碑〉。此碑記載了清初統治者在歷次戰爭勝利之後不斷加封護國神關帝的經過，云：「茲舉我昭代所以尊崇祀事與帝所以護國佑民者言之：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康熙三十六年平定朔漠，雍正三年平定青海，追封三代。乾隆間剿林逆於臺灣，執醜虜於西藏，進號『協天』，再加『靈佑』。嘉慶朝一顯於西蜀，獲王三槐而僇之；再顯於惠州，而斬爛屐四已；又發林清黨數百人之外，一時雷電合作，帝儼然上臨，進號『仁勇』。」（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三八〈金石六〉，頁522–23）

²⁰³ 宣統《南海縣志》，卷十三〈金石畧二〉，頁328。

的，而其他十四座，則有兩座天后廟在新城內街，四座在下西關區，二座在東門外；北帝廟則有四座在上、下西關，一座在新城外街，一座在大東門外三里。從〔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標示的天后廟和北帝廟的位置來判斷，這兩類專祀水（海）神的祠廟較集中在新城和下西關兩片明清以來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經濟發展區，如下西關區即有七座天后廟和北帝廟，而新城區則有四座是專祀或合祀的天后廟和北帝廟（見地圖七：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區八座天后廟分佈位置）。²⁰⁴然而，根據上文描述清代廣州城區的經濟發展趨勢，廣州城南新城沿江北岸和城西大平門外十三行街區都是商業興盛區，兩地的共同特徵是處於廣州城西邊南瀕江河的地區。因此，較多數量的天后廟和北帝廟創建於近江一帶地區，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仇巨川說，天后宮以「五仙、靖海兩門內最為雄壯」。五仙門和靖海門為新城的兩座城門。五仙門，明代稱五羊門，在五羊驛街，驛臨珠江，順治八年始改稱為五仙門。²⁰⁵五仙門附近有水母灣、木排頭、沙洲巷等，為沿江碼頭區，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忠即是在五羊門外五羊驛街左興建了一座天后廟。²⁰⁶道光《南海縣志》稱天后為「莆田林氏女，至孝，能知人禍福，沒而祀之，航海者禱輒應」。²⁰⁷奉祀天后的人，大多數是出海捕魚者及航海商旅。十九世紀初西方人所目睹和經歷的廣州城有兩種特色，其一是在廣州城的街道上整天擠滿了人，其二是廣州城前珠江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船舶。裨治文〈廣州城概述〉記載：「靠着城市的江面上，船隻的總數看來有84 000艘。這些船艇絕大部分是蛋家艇。……那84 000艘船艇中，每艘船只要有平均不到三個人，總數就是252 000人。」²⁰⁸所謂「蛋家艇」，是指以船艇為整個家庭唯一的生活住所。²⁰⁹大多數蛋民靠出海捕魚撈蝦為生。²¹⁰嘉靖《廣東通志》云：「蛋戶者，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瀕水而居。」²¹¹據說，「蛋家害怕出海捕魚撈蝦作業時有翻船的危險，吃魚時不許翻轉魚身，就連舀湯的勺也不許反扣，總之，

²⁰⁴ 廣州新城內大新街有一座大新古廟，廟祀「文昌、關帝、北帝、華帝像。左有山茶社，即前明山茶巷舊址。廟與社皆建自前明。國朝嘉慶乙亥〔1815〕，商民擴修廟宇」（《白雲越秀二山合志》，卷十一，頁十下）。

²⁰⁵ 見注16。

²⁰⁶ 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稱五仙門天后廟在「日軍侵華時炸廣州，毀」（頁375）。

²⁰⁷ 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頁十四下。

²⁰⁸ 裨治文：〈廣州城概述〉，頁319–20。另參亨特：《舊中國雜記》，頁211。

²⁰⁹ 關於廣州珠江面上蛋民的研究，參陳序經：《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伍銳麟：〈沙南蛋民調查〉，《嶺南學報》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頁1–151；收入伍銳麟（著）、何國強（編）：《民國廣州的蛋民、人力車夫和村落：伍銳麟社會學調查報告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7–163；黃新美：〈廣州水上居民的「蛋艇」〉，《廣州研究》1985年第6期，頁41–42。

²¹⁰ 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廣州景觀（1517–1840）〉，頁105、163–70。

²¹¹ 嘉靖《廣東通志》，卷六八，頁1854。

他們忌諱一個『翻』字」。²¹²天后是航海商旅及出海漁民敬奉的神明。傳說，颶風大作，船幾翻覆之時，禱告天后輒應，水不揚波。²¹³既然天后信仰與漁民出海祈求安全作業有密切關係，我們可理解在廣州新城沿江河和下西關瀕臨珠江口一帶地區合共建有至少六座天后廟的因由。

上文已指出在城西上、下西關的二十五座祠廟之中，有北帝廟四座，佔全廣州城北帝廟總數的57%。其中三座北帝廟建於下西關區，這與西關郊區的經濟開發有密切關係。這種祠廟往下西關發展的趨勢不單反映在北帝廟和天后廟的分佈，也可從道光年間下西關合共有十六座祠廟的數字（佔全廣州城七十八座祠廟約21%）中得到證明。舊城乃是廣州府的軍事和政治中心，城內祠廟多屬官廟或是受官府大吏的支持和影響，其中以關帝廟、文昌宮、城隍廟、東嶽廟、龍王廟、五仙觀、元妙觀最為代表。但是，下西關的十六座祠廟卻與廣州府官衙沒有密切的往來關係。除去三座北帝廟和四座天后廟，下西關區的祠廟還有兩座三界廟、兩座華光廟、一座土地廟、一座文昌宮、一座城隍廟、一座洪聖廟、一座關帝廟。下西關區的祠廟是以鄉里民眾、商賈和士紳為主要支持者的民間祠廟，沒有受到官府大吏太大的左右。上文曾經提及新基街北帝廟在神誕報賽時的熱鬧盛況，官修的同治《南海縣志》則以「粵俗佞神，而奢侈奢靡特甚」為貶評。而在記錄了道光二年大火後重修新基街北帝廟的〈重建廣州城西真武廟碑記〉裡，撰碑者提及重修廟宇的經費助資者時，僅稱：「鄉人捐貲修復，凡七千餘人，得銀三萬兩有奇。」同樣是下九甫的關夫子廟，據上文引〈重修城西關聖帝君祖廟碑記〉的記錄，在康熙十二年時重修時，經費無非來自鄉里父老和城內外商賈而已。碑記云：「舊歲壬寅，黃君有章、洪君運楫、林君國梓、陳君邦隆、趙君汝成等捐資，仍募仙城內外紳士商賈，并撤而新焉。」

廣州城西郊祠廟多屬於非官方的民間祠廟，又可以現今仍存的泮塘鄉仁威廟為第三個例子。現泮塘鄉仁威廟存有明、清時期的碑記八通，石碑三十塊。²¹⁴其中屬明代的碑記有：（一）天啟二年（1622）〈重修真武廟記〉；（二）崇禎七年（1634）〈祖師玄天上帝顯靈感應杯圖〉。屬清代的碑記有：（三）順治十八年〈重修北帝祖廟碑記〉；（四）康熙十七年（1678）〈北帝廟香燈祭業碑〉；（五）康熙五十二年（1713）〈鼎建仁威祖廟天樞宮題名碑文〉；（六）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仁威祖廟碑記〉；（七）乾隆五十年（1785）〈重修仁威古廟碑記〉；（八）同治六年（1867）〈重修仁威祖廟碑記〉。²¹⁵仁

²¹² 黃新美：〈珠江流域水上居民的歷史與現狀〉，《嶺南文史》1995年第4期，頁44。

²¹³ 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186。

²¹⁴ 陳建華（主編）：《廣州市文物普查匯編·荔灣區卷》（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年），頁232-33。

²¹⁵ 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242-312收錄了仁威廟明清時期刻立的八通原碑及其附錄文。對於八通仁威廟碑記的研究，見黎志添：〈現代都市中道教廟宇的轉型〉，頁143-48。

威祖廟是在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創建的，有很長的一段時期稱為真武廟。到了清代初期，〈重修北帝祖廟碑記〉和〈北帝廟香燈祭業碑〉都已改稱為北帝祖廟。康熙五十二年時，就用了仁威祖廟的名稱。²¹⁶同治《南海縣志》稱恩洲堡泮塘鄉仁威廟「祀產頗饒」，這應是正確的，例如在清軍攻入廣州城不久，泮塘鄉的鄉里父老子弟就能夠在順治十八年籌集醵金，為仁威廟重修及擴充，這反映了兩藩率領的二萬餘兵將於順治七年攻破廣州城之役，並未對城西富饒的鄉郊村落造成重大的破壞。〈重修北帝祖廟碑記〉云：「皇清定粵，四郊軍壘，干戈不擾；兵燹以來，廟貌如故。帝力之覆護斯民者，如此其奕奕也。」據該碑記錄的捐金者名單，順治十八年仁威廟的重修獲得545人的助捐，合共得銀四百兩六錢。在這545人的名字中，沒有出現廣州府官衙兵將的名字。這種情況同樣見於其他的重修碑記。〈鼎建仁威祖廟天樞宮題名碑文〉記錄了捐金者439人，合共捐金一百一十七兩三錢九分。乾隆十三年〈重修仁威祖廟碑記〉記錄了捐金者共有958個名號，包括個人、商鋪和香會，合共捐金一千一百零五兩一錢。乾隆十三年仁威廟重修捐金者名單的特別之處，在於出現了很多商鋪的名字，如南海當行、泰和行、長豐行、西關按押行、永裕行、經綸行等。此外，又有許多不同的香會組織名稱，如鴻光會、義威會、裝金會、出遊會、福聚會、福緣會等。這些碑記資料充分說明了廣州城西關民間祠廟的存在及其組織和管理運作情況，這些廟宇是以鄉里民眾、商賈和士紳為主而組織起來的民間廟宇，沒有受到過多官府大吏的影響。

結語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傳統的地方文獻、原始的廟宇碑刻資料和長期的田野考察成果，結合地圖的空間屬性資料，試圖解釋一般地方祠廟文獻研究所未能表達出的具有真正空間意義的廟宇歷史信息。研究對象是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內和城郊地區的七十八座祠廟以及它們在城市的空間分佈。從空間的分析角度，本文具體說明了清代廣州舊城、新城、城外西關地區的發展和擴張與祠廟數量增長相對應的關係。本文分析這七十八座祠廟的分佈，首先，舊城內有二十八座，數量最多，佔全數的36%，而且由於舊城是官方統治的核心區域，因此這些祠廟多屬官廟，或受官府的支持和影響，例如關帝廟、文昌宮、龍王廟、都城隍廟、東嶽廟、三元宮、應元宮、五仙觀、元妙觀等。其次，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中標示的八座天后廟和七座北帝廟的位置來判斷，這兩類專祀水(海)神的祠廟較集中在新城和下西關兩片明清

²¹⁶ 〈鼎建仁威祖廟天樞宮題名碑文〉云：「友人黃子東穆，同西郊泮塘鄉長者過予，請為文，言及鄉中素事上帝香火，其廟榜曰『仁威祖廟』。」〈重修仁威古廟碑記〉云：「廣州府城之西四里而近，地為南海之半塘，有廟以奉真武之神，鄉人所稱『仁威廟』者也。」見黎志添、李靜：《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頁260、276。

以來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經濟發展區。此外，從道光年間城外下西關合共有十六座祠廟的數字來看，這種祠廟往下西關發展的趨勢與城外西關郊區的經濟開發及十八甫形成新的商業街圩有密切關係。以新基街北帝廟、下九甫關夫子廟和泮塘鄉仁威廟為例，下西關區的祠廟是以鄉里民眾、商賈和士紳為主而組織起來的民間祠廟，沒有受到官府大吏太大的影響。

不論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所標注的三十六座祠廟，抑是筆者所增補及繪製的〔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七十八座祠廟，道光年間在廣州城內和城郊實際存在的祠廟數目，遠遠多於官方祀典之內的祠廟數量。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二〈建置略四·壇廟〉（祀典儀注附）所列的正祀神明包括有社稷神、先農神、勾芒神、雲雨風雷之神、太歲神、南海神、火神、城隍神、文昌帝君、關聖大帝、龍神、北帝、天后等。官方所謂的「正祀」，是指「唯是禦災捍患，與死勤事勞定國，凡有功德於民者祀之」。²¹⁷然而，在正祀廟宇之外，道光年間在廣州城內及城郊地區卻建有很多其他奉祀不同神明的民間祠廟，據文獻資料記載，這些祠廟香火鼎旺，在神誕報賽日更是盛況熱鬧，如金花廟，「每首夏神誕報賽者，烟花火爆，百戲駢集，歌舞之聲，旬月未已」。²¹⁸又如在舊城內雙門底隆重舉辦的華光神誕，「會城每歲九月華光神誕，里人先期於雙門設壇，延羽流誦經，謂之保境平安醮。是風盛於道光乙未、丙申間，嗣後愈熾」。²¹⁹對於廣東省城百姓尚多「淫祀野廟」，官修方志每每概括為「粵俗佞神」。²²⁰事實上，清代廣州城一直有不少祠廟，民間祀神信仰盛行。正如筆者在另文指出，過去有些學者在研究傳統中國鄉村宗族與祠廟組織的關係時，過於強化一種正統與異端的對立模式，認為參拜淫祠神廟是在國家正統文化之外的歧異行為。²²¹然而道光年間在廣州城存在的七十八座祠廟正好反映了以下的客觀事實：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一直存在著如此之多的祠廟，官方正祀與民間神祠並非必然經常處於截然兩立、衝突和排斥的狀態。一些非常極端的搗毀淫祠的官方命令，往往是短暫的且成效有限的，如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廣東提學魏校在廣州府城推行的搗

²¹⁷ 乾隆《廣州府志》，卷十七，頁一上。

²¹⁸ 梁佩蘭：〈金花廟前新築地基碑記〉，頁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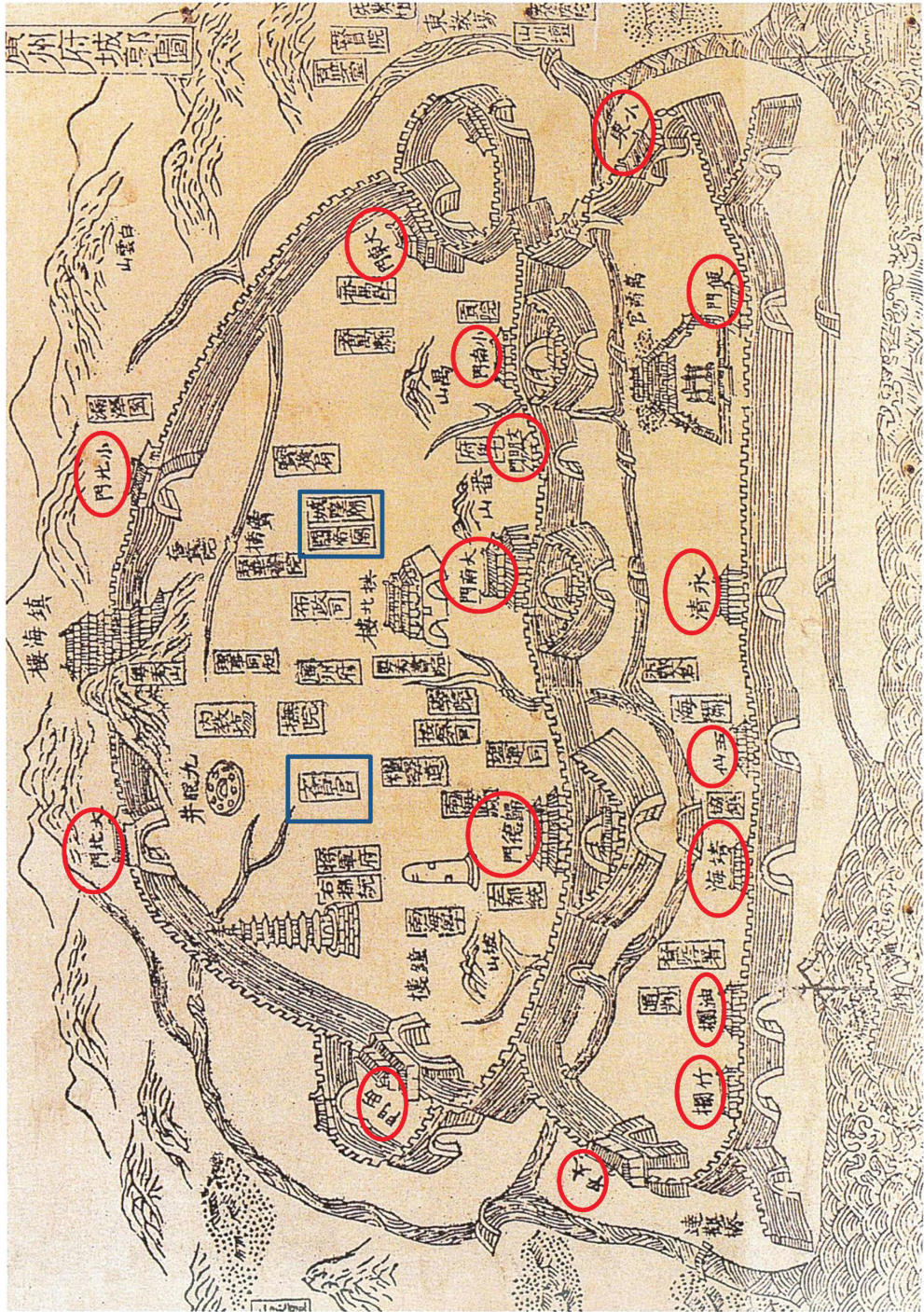
²¹⁹ 陳徽言：《南越遊記》，卷二，頁291。

²²⁰ 同治《南海縣志》，卷二六，頁432。嘉靖《廣東通志》卷二十載：「〔廣州府〕習尚，俗素尚鬼，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觀。」（頁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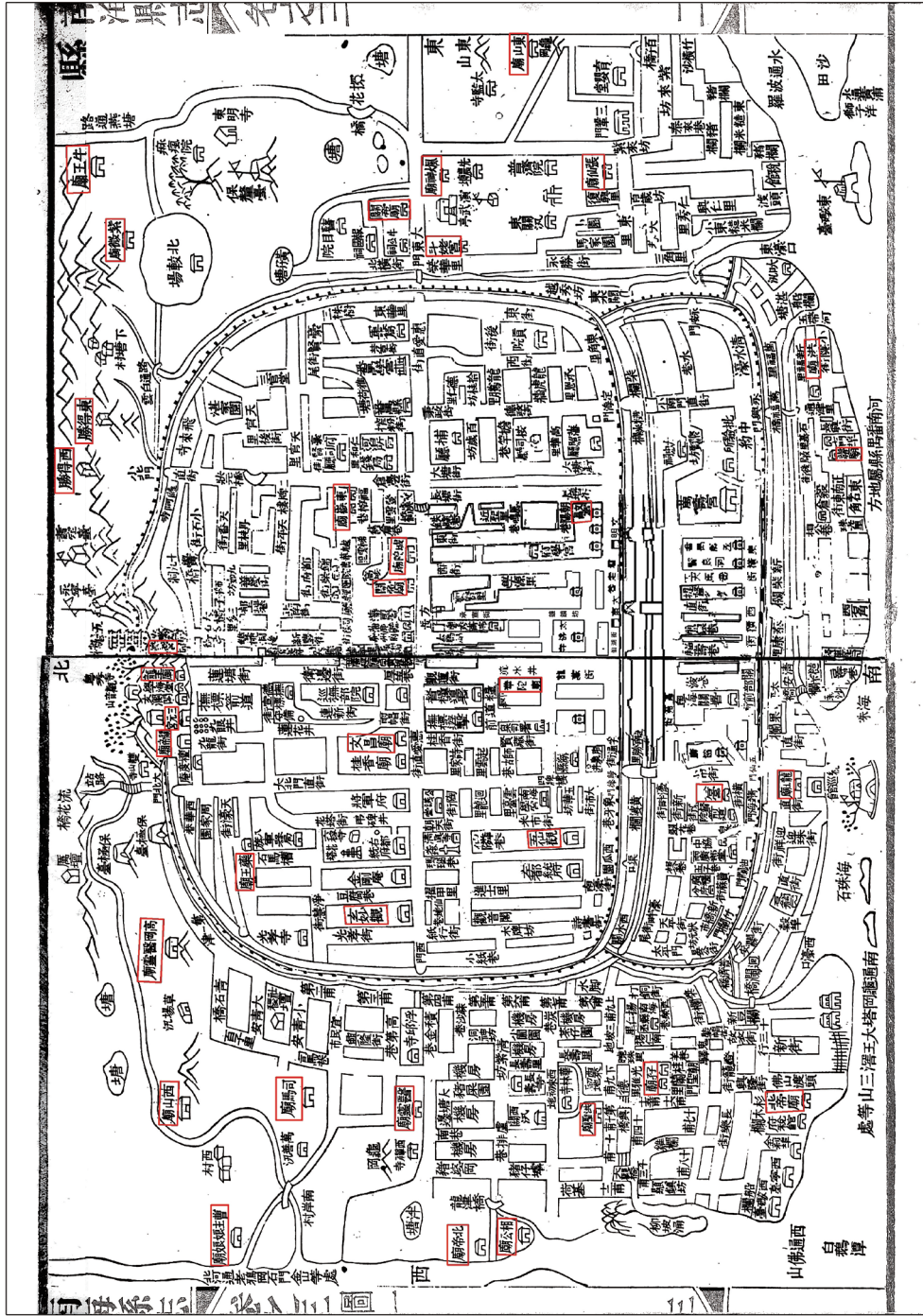
²²¹ 黎志添：〈「神道設教」：從廣州府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探索明清士大夫對民間神祠廟宇的立場〉，載陳熙遠（編）：《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457-97。至於從明清時期國家正統化的角度研究地方廟宇神明崇拜的異端性，參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3-14；科大衛、劉志偉：〈「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歷史人類學學刊》第6卷第1、2期合刊（2008年），頁1-21。

毀淫祠令。反之，雖然淫祠被劃出在正祠之外，但是筆者認為，研究者不應輕易把華光廟、金花廟、三界廟、斗姥宮、先鋒廟等在廣州城盛行的祠廟看作國家正統祭祀文化之外的異端傳統。至少，經過細緻的文獻爬梳，包括碑刻資料及客觀的廟宇存在事實，並在此基礎上繪製「〔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七十八座祠廟分佈」圖，本文認為中國地方祠廟研究不應繼續站在二元對立的立場去理解民間祠廟及其神明信仰與官方的正祀規範之間複雜和互補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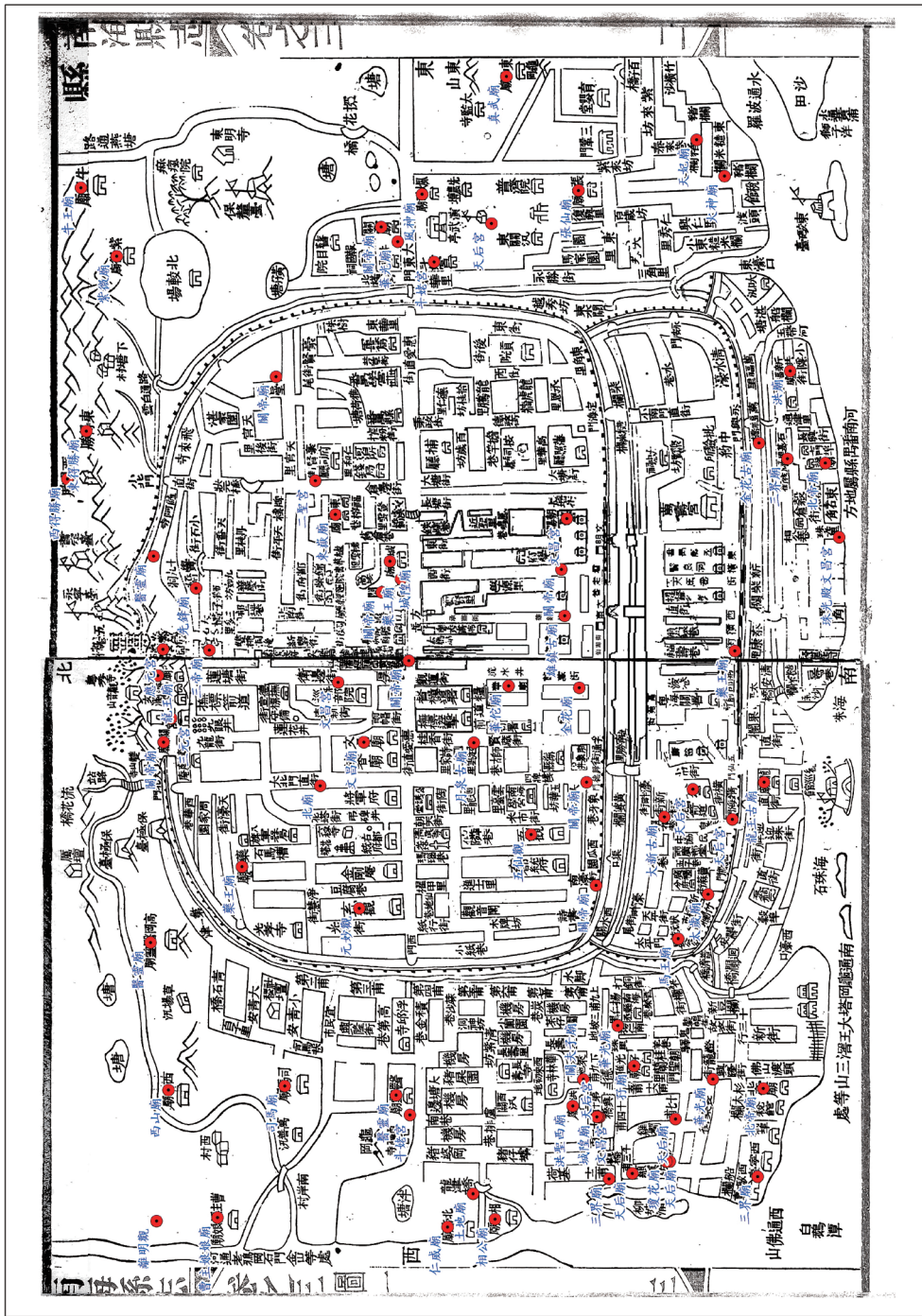
地圖一：乾隆《廣州府志》廣州府城郭圖



地圖二：道光《南海縣志》廣州省城全圖三十六座祠廟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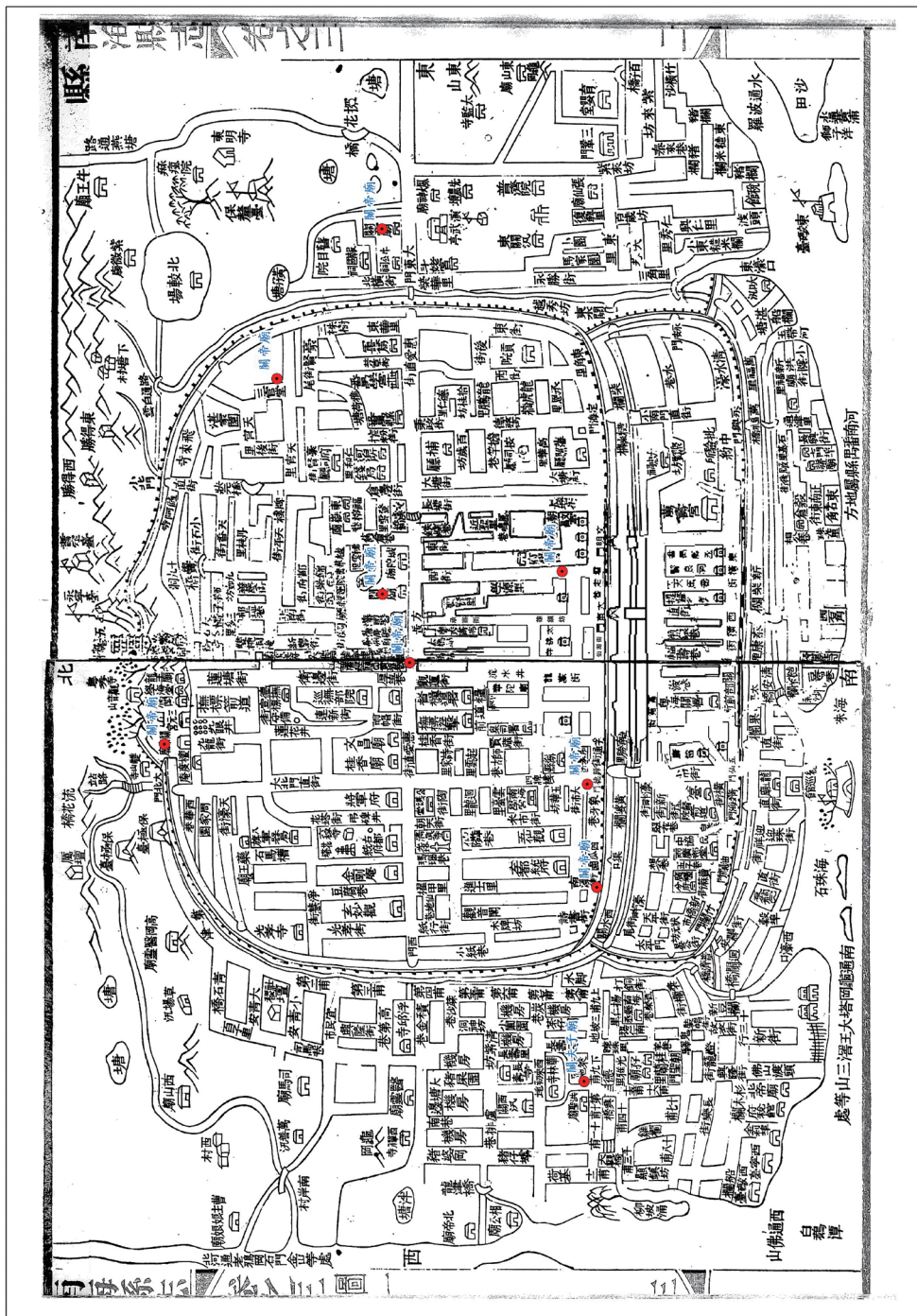
地圖三：〔新增〕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七十八座祠廟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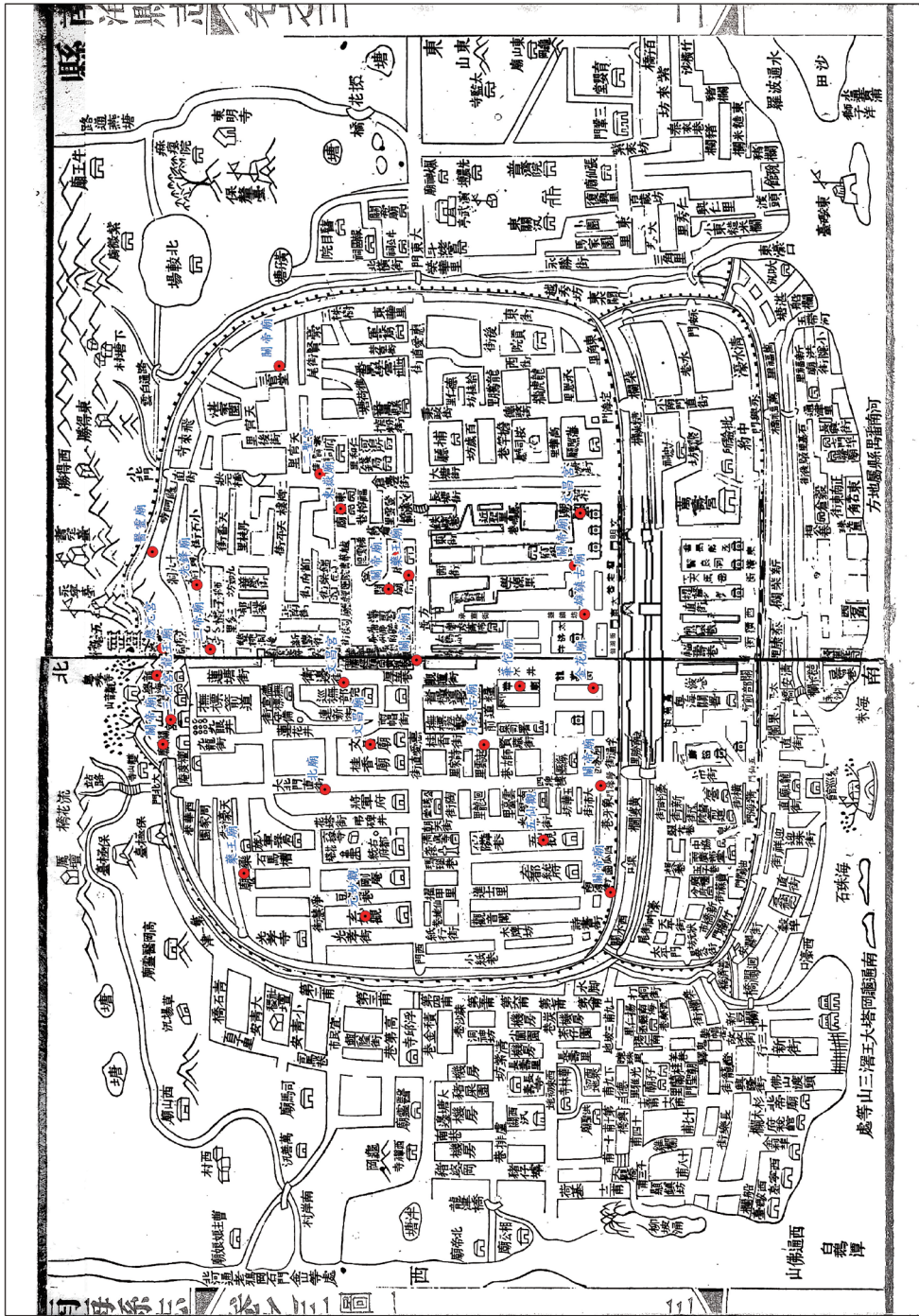
地圖四：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七十八座祠廟分佈 (以 1948 年《廣州市街道詳圖》為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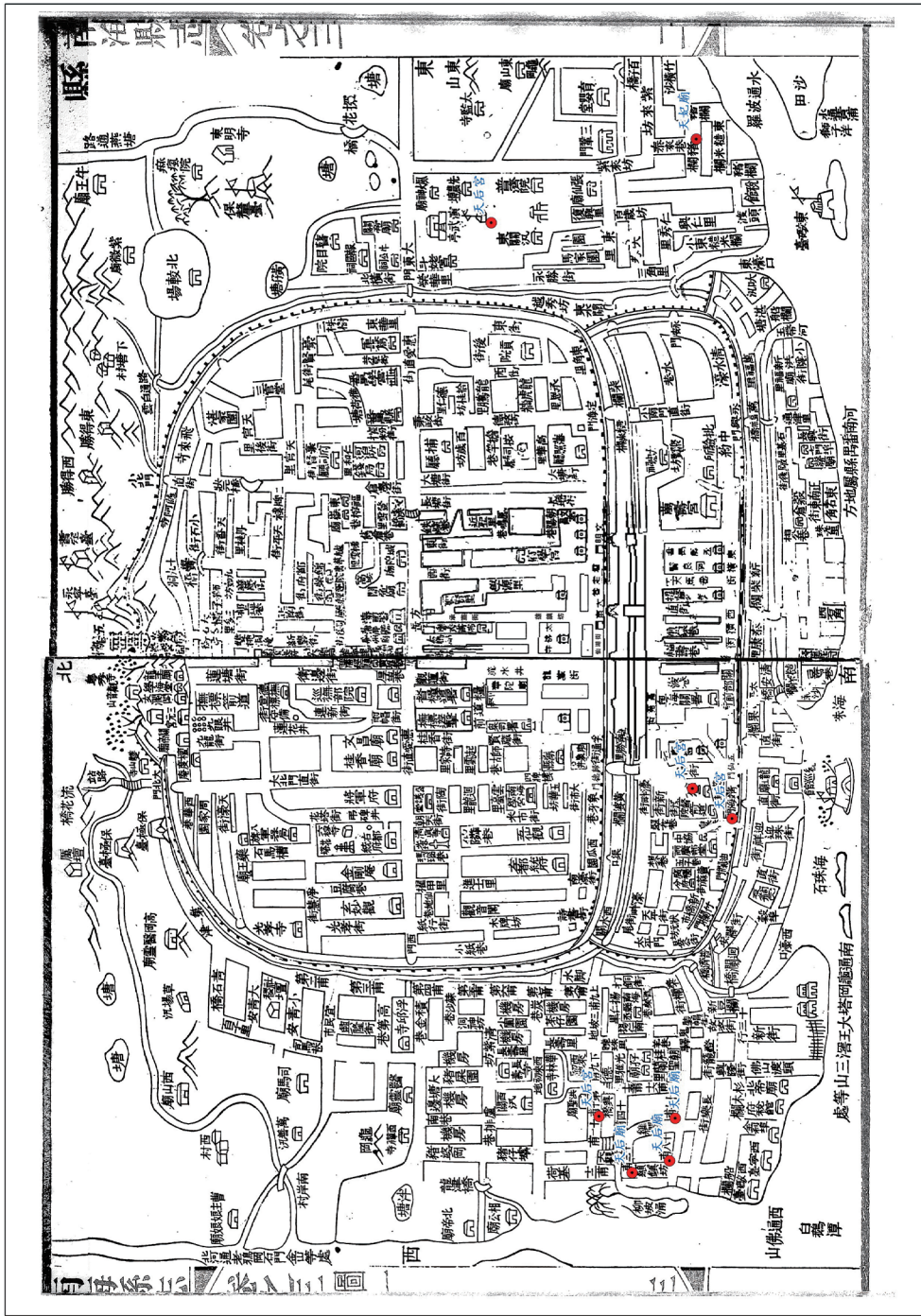
地圖五：道光年間廣州舊城二十八座祠廟分佈位置圖



地圖六：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十一座關帝廟分佈位置



地圖七：道光年間廣州城區八座天后廟分佈位置



圖片一：華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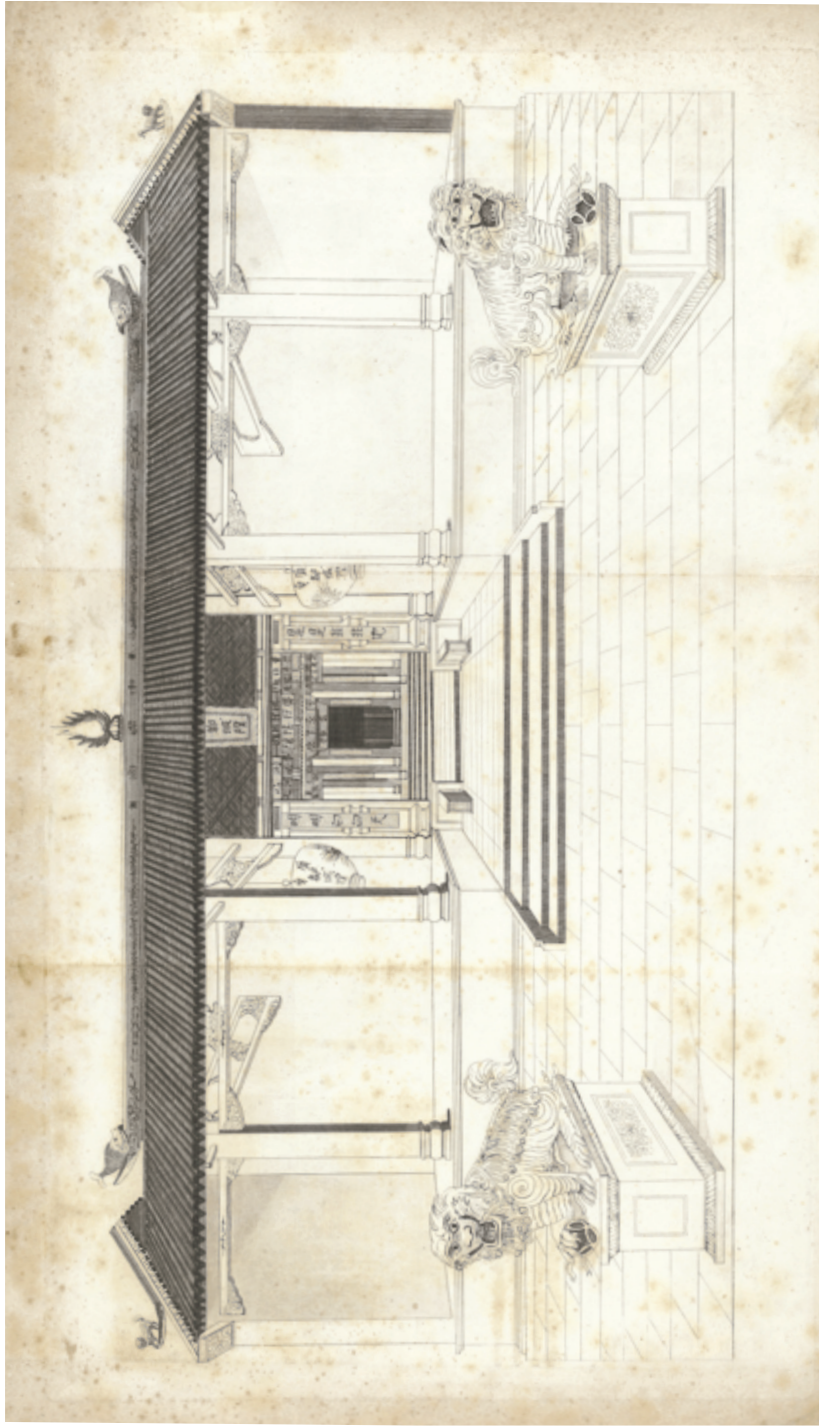
2012年筆者攝於廣州小谷圍華光古廟

圖片二：清代廣州廟宇前搭建的戲台



圖片來自 Peabody Essex Museum (收藏號：E85112), East India Square, Salem, MA 01970, USA。感謝 William Ma 提供此圖及所藏的信息，並且感謝 Peabody Essex Museum 准許本文刊登此圖。

圖片三：雍正年間廣州城隍廟線描圖



圖片來自 Joseph Hager Sinologe, *Pantheon chinois ou parallèle entre le culte religieux des grecs et celui des chinois: avec de nouvelles preuves que la Chine a été connue des grecs et que les sèrès des auteurs classiques ont été des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de P. Didot l'Aîné, 1806)。這本書現由蘇黎世中央圖書館 (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收藏。感謝林思婷小姐提供此圖片的信息。另參林思婷：〈近代廣州城隍廟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6年)。

附表一：道光年間廣州城區七十八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廟宇名稱(數目)	地區/舊城/新城/街道	廟宇名稱(數目)	地區/舊城/新城/街道
1 二聖宮(1)	舊城豪賢街	40 金花古廟	新城外萬福橋側
*2 三元宮(1)	舊城粵秀山	*41 城隍廟(2)	舊城惠愛街七約
3 三界廟(3)	新城外街石基里	42 城隍廟	西門外第十舖
4 三界廟	城西十二舖	*43 洪廟(2)	新城外新福里
5 三界廟	西門外	*44 洪聖西廟	西門外第十舖
6 三帝廟(1)	舊城大石街	*45 相公廟	西門外
7 土地廟(1)	西門外龍津橋	*46 風神廟(1)	東門外教場後
*8 天后宮(8)	新城內五羊驛之東	47 馬王廟(1)	新城內狀元坊
9 天后宮	東門外東校場旁	*48 東得勝廟	在小北門外一里
10 天后宮	新城內	*49 西得勝廟	北門外
11 天后宮	西門外第十舖	50 華光廟(4)	東門外
12 天后廟	西門外第十三舖	51 華光廟	西門外燈籠巷
13 天后廟	西門外第十七舖	52 華光廟	太平門外楊仁里
14 天妃廟	小東門外	53 月泉古廟	舊城馬鞍街
15 天后廟	西門外第十八舖(懷遠驛街)	*54 華佗廟(1)	舊城九曜坊
*16 文昌廟(5)	舊城桂香街	*55 張仙廟(1)	東門外
*17 文昌宮	舊城府學東街	*56 龍王廟(2)	舊城粵秀山下
18 文昌宮	舊城衛邊街	*57 龍王古廟	新城外五羊驛前街
19 文昌宮	西門外第十舖	*58 藥王廟(3)	舊城石馬槽
20 珠光殿文昌宮	新城外珠光里	59 藥王廟	新城西橫街
*21 五仙觀(1)	舊城十賢坊	60 藥王廟	舊城城隍廟右
*22 牛王廟(1)	小北門外	*61 關帝廟(11)	舊城粵秀山麓
23 大新古廟(1)	新城內大新街	*62 關帝廟	舊城城隍廟右
*24 斗姥宮(2)	東門外線香街	*63 關帝廟	東門外教場
25 斗姥宮	西門外蘆荻巷口	64 關帝廟	舊城育賢坊
26 太歲廟(1)	新城內賣麻街	65 關帝廟	舊城南濠街
*27 北帝廟(7)	太平門外新基街	66 關帝廟	舊城拱宸街
*28 北帝廟(仁威廟)	西城外恩洲堡泮塘鄉	67 關帝廟	歸德門內
*29 北帝廟	新城外珠光里東	68 關夫子廟	西門外下九甫西來初地
30 北廟	舊城大北門直街	69 關帝廟	舊城清風橋
*31 孖廟	西城外朝聖古道	*70 應元宮(1)	舊城粵秀山下
*32 西山廟	城西第一津草場	*71 紫微廟(1)	城北外北校場
*33 東山(真武)廟	大東門外三里	*72 曹主娘娘廟(1)	西門外恩州堡鑾步
34 火神廟(1)	東關糙米欄	73 瓊花廟(1)	城西十八舖
*35 元妙觀(1)	舊城淨慧街	74 離明觀(1)	西門外鑾步村
*36 司馬廟(1)	西門外	75 雄鎮古廟(1)	舊城雄鎮坊
37 先鋒廟(1)	小北門內巒橋	*76 醫靈廟(3)	城西高岡
*38 東嶽廟(1)	舊城布政司後街	*77 醫靈廟	西門外蘆荻巷
39 金花廟(2)	舊城仙湖街清源巷口	78 醫靈廟	舊城小北門附近

案：有*號的祠廟，為三十六座在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以直接找到顯示名稱的祠廟。

附表二：道光年間廣州舊城區二十八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廟宇名稱	舊城	廟宇名稱	地區/街道/城內、外
1 二聖宮	舊城豪賢街	21 關帝廟	舊城育賢坊
2 三元宮	舊城粵秀山	22 關帝廟	舊城南濠街
3 三帝廟	舊城大石街	23 關帝廟	舊城拱宸街
4 文昌廟	舊城桂香街	24 關帝廟	舊城歸德門內
5 文昌宮	舊城府學東街	25 關帝廟	舊城清風橋
6 文昌宮	舊城衛邊街	26 應元宮	舊城粵秀山
7 五仙觀	舊城十賢坊	27 雄鎮古廟	舊城雄鎮坊
8 北(帝)廟	舊城大北門直街	28 醫靈廟	舊城小北門附近
9 玄妙觀	舊城淨慧街		
10 先鋒廟	舊城小北門內鬻橋		
11 東嶽廟	舊城布政司後街		
12 金花廟	舊城仙湖街清源巷口		
13 城隍廟	舊城惠愛街七約		
14 月泉廟	舊城馬鞍街		
15 華佗廟	舊城九曜坊		
16 龍王廟	舊城粵秀山		
17 藥王廟	舊城石馬槽		
18 藥王廟	舊城城隍廟右		
19 關帝廟	舊城粵秀山		
20 關帝廟	舊城城隍廟右		

附表三：道光年間廣州新城內、外地區十二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廟宇名稱	地區/街道/新城內、外
1 天后宮	新城內歸德門外五羊驛之東
2 天后宮	新城內靖海門內
3 大新古廟	新城內歸德門外大新街
4 太歲廟	新城內靖海門內賣麻街
5 馬王廟	新城內太平門狀元坊
6 藥王廟	新城內西橫街
7 三界廟	新城外石基里
8 珠光殿文昌宮	新城外珠光里
9 北帝廟	新城外珠光里東
10 金花古廟	新城外萬福橋側
11 洪廟	新城外新福里
12 龍王古廟	新城外五羊驛前街

附表四：道光年間廣州城外西關地區二十五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廟宇名稱	城外西關	廟宇名稱	地區/街道/城內、外
1	三界廟 西門外十二舖	21	曹主娘娘廟 西門外恩州堡繒步
2	三界廟 西門外	22	瓊花廟 西門外十八舖
3	土地廟 西門外龍津橋	23	離明觀 西門外繒步村
4	天后宮 西門外第十舖	24	醫靈廟 西城外蘆荻巷
5	天后廟 西門外第十三舖	25	醫靈廟 城西高岡
6	天后廟 西門外第十七舖		
7	天后廟 西門外十八舖(懷遠驛街)		
8	文昌宮 西城外第十舖		
9	斗姥宮 西門外蘆荻巷口		
10	北帝廟 太平門外新基街		
11	北帝廟 西城外恩洲堡泮塘鄉		
12	孖廟 西城外朝聖古道		
13	司馬廟 西門外		
14	西山廟 城西無第一津草場		
15	城隍廟 西門外第十舖		
16	洪聖西廟 西門外第十舖		
17	相公廟 西門外		
18	華光廟 西門外燈籠巷		
19	華光廟 太平門外楊仁里		
20	關夫子廟 西城外下九甫西來初地		

附表五：道光年間廣州東門外及北門外地區十三座祠廟名單及所在位置

廟宇名稱	地區/街道/城內、外
1	天后宮 東門外東校場旁
2	天妃廟 小東門外
3	斗姥宮 東門外線香街
4	東山(真武)廟 大東門外三里
5	火神廟 東門外糙米欄
6	風神廟 東門外教場後
7	華光廟 東門外
8	張仙廟 東門外
9	關帝廟 東門外教場
10	牛王廟 小北門外
11	東得勝廟 小北門外一里
12	西得勝廟 北門外
13	紫微廟 城北外北校場

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及其意涵： 以道光十五年「廣州省城全圖」為考察中心

(提要)

黎志添

清道光十五年(1835)潘尚楫、鄧士憲等纂的《南海縣志》中的「縣治附省全圖」(本文統稱道光「廣州省城全圖」)，除了標注城內建築物如官衙和府學，還標注出在城內和城郊地區眾多的祠廟、道觀和佛寺。與明代和清初志書中的廣州城地圖的最大分別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製圖方法已經不再沿用對景法，而是特別明確地繪製出城內和城郊的道路網線和街道名稱。結合在圖中的祠廟標注和明確的街道路線的地理資訊，研究者根據該圖更能掌握和進一步分析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和歷史演變，以及與明清以來廣州城地理變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本文研究廣州城區祠廟分佈的方法，主要是以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為底圖，進行直接、間接和推算的定點工作，儘量找到七十八座廣州城區祠廟所在的街道位置。在地圖上確定了這七十八座祠廟的位置標定之後，進而在新增的定位點的地圖中，從總體的分佈情況和空間位置關係的角度，探討在道光年間這七十八座祠廟在廣州城區的佈局及它們與廣州舊城、新城及城郊地區的城市發展之間的關係。本文以傳統地方文獻和相關廟宇的碑刻資料結合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空間屬性資料，試圖研判出一般地方祠廟文獻研究所未能表達出的具有空間意義的廟宇歷史信息。從空間的分析角度，本文具體說明了清代廣州舊城、新城、城外西關地區的發展和擴張與祠廟數量增長相對應的關係。

關鍵詞： 清代廣州祠廟 清代廣州城 廣州民間廟宇 廣州廟宇空間分佈
歷史地理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Temple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and Its Mea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zhou shengcheng quantu*

(Abstract)

Lai Chi Tim

The *Xianzhi fu shengquantu* (also named the *Guangzhou shengcheng quantu*, Map of Guangzhou City) in the *Nanhai xianzhi* (Gazetteer of Nanhai), compiled by Pan Shangji and Deng Shixian et al.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Emperor Daoguang's reign (1835), includes the locations of government and schools, as well as the locations of shrines, Daoist and Buddhist temples in urban and rural Guangzhou. In contrast to maps printed in gazetteers in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is map does not adopt the realistic painting method; instead, it accurately labels stree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ity. Wit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temples and streets provided on the map, researchers can better observe and analys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 change of this ci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les by locating the 78 temples inside the city of Guangzhou based on the Daoguang edition of the *Guangzhou shengcheng quantu*. 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and calculation, the revised map with the 78 temples shows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the temples, and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 modern and rural areas of the city. This study combines traditional local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steles in the temple, with spatial data, namely, the *Guangzhou shengcheng quantu*,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space, which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research.

Keywords: Guangzhou temples of the Qing period Guangzhou city in the Qing period
popular temples in Guangzhou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uangzhou temples
historical geography